

历史文史资料选辑

3

中国民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一)右上：

郭沫若
同志题石钟
山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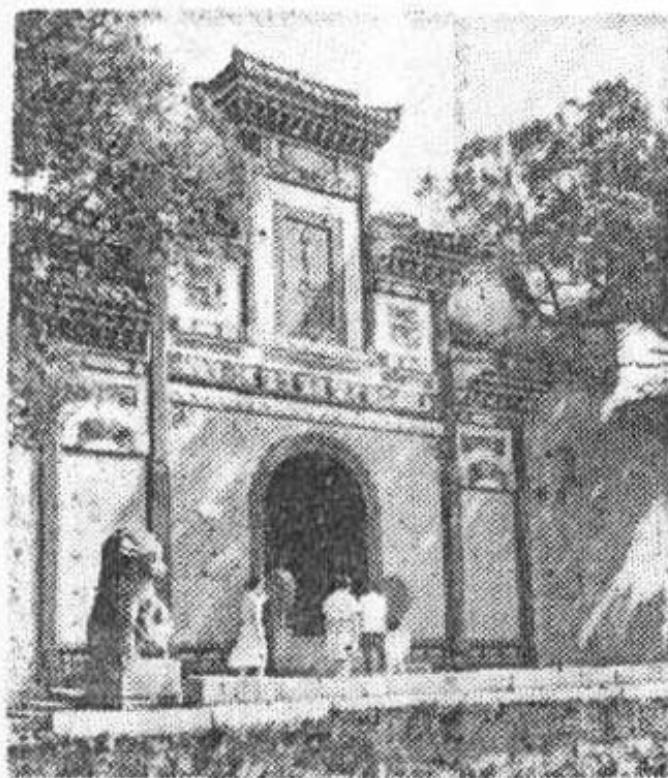
(二)左上：

苏轼夜
泊处。



(三)下：

石钟山
全景。



(四) 太平遗垒：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在石钟山驻守五年。这里原来是太平军的营房堡垒。

（以上一、二、三、四图片
均孙之光摄）



袁文才烈士



王佐烈士

4t265/33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日报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4.2印张 字数14万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定价每册0.7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湖口起义的回忆 伍毓瑞遗作 (1)
讨袁时期赣军的具体活动和作用 龚师曾遗作 (10)
湖口起义亲历记 张岂庸遗作 (23)
石钟山今昔 袁 作 (25)
- 北伐军攻克南昌前后记略 李世璋 (41)
- 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谭志刚 (49)
随八一起义军南下略记 陈勉哉 (62)
高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倪南山 (81)
✓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始末 刘晓农 (110)
✓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 裴之倬、邹耕生 (121)
翻越夹金山 艾德义 (133)
斗A·B·团 抓程天放 陈勉哉 (138)
- 贺怡同志在赣州 王贤选、何 磊 (145)
- “五四”运动在南昌 徐树镛、王咨臣 (151)
江西最早的一所革命学校 王 康 (164)
抗战时期江西妇女运动的回顾 周志方 (168)
- 蒋介石的吗啡工厂 彭善后 (194)
封面设计 彭友善

湖 口 起 义 的 回 忆

伍毓瑞 遗作

(一) 起义原因

1、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根本不能相容。当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后，由于资产阶级本质的软弱性，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就与袁世凯妥协，并把政权让了出来，这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而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以后，就利用其小站陆军的威力，和帝国主义的撑腰，以及所谓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拥护等等有利条件，来实现其专制独裁和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一切异己的势力，必须铲除尽净，决不容许异己的国民党来分散他们的政权。

2、袁世凯既已狙杀了宋教仁，又借到了五国银行团二千五百万镑巨款，早就作好了发动内战之准备，最后终于免去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职，一面布置冯国璋、张勋相机进袭南京，段芝贵率领李纯、王占元进驻江西。

由于这些原因，使孙中山先生忍无可忍，认为非去袁不可，乃自日本回到上海，策划反袁。首先密令闽、粤两省发难，可是闽粤以内部有困难，未敢发动。湖南的情况，亦复如此。孙中山先生乃派张继、邵元冲、白逾恒、马君武四人来赣，授意李烈钧

讨袁。李顾虑如果在免职之后，立时发动，好象是为个人权位而战，世人或不见谅。遂先行赴沪，与孙面商举义一切具体办法。孙先生当即召集在沪革命党人开会。李起立发言，坚决拥护孙先生的讨袁主张，并自告奋勇愿回江西发难。于是大家公推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会后，李遄赴湖口起义。这是巩固共和，反对专制独裁的正义战争，给全国人民以极其巨大的影响。

(二) 起义经过

李烈钧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日左右，从上海回到湖口，召集在湖口及其随行高级官员开会。与会者有水巡总监何子奇、团长李明扬、周壁阶、吴安伯、机关炮营长卓仁机、省参议员杨赓笙等。会议决定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并推杨赓笙撰拟讨袁檄文，大意是：民国肇创以来，凡我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全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七月十二日，江西省议会通电全国一致声讨，并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贺国昌为江西民政长、俞应麟为军务厅长兼兵站总监。欧阳武、贺国昌等于是南昌分别就职，并通电讨袁，布告人民，一时民气为之大振。李烈钧在湖口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后，即策定作战计划，区分军队为右翼军、左翼军。派江西混成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江西第一

师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并以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祺为参谋长。其时，江西的军队有陆军两个师，外加方声涛一个旅和第九、第十两个团，一个独立营，共计五个旅、十个团、一个营。第一师师长欧阳武驻省城，所属第一旅旅长林虎，第一团长杨祖世，第二团长李思广（新兵）驻德安、瑞昌。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团长伍毓瑞，率二、三两营驻九江，其第一营则调省护卫都督府。第四团长吴安伯（新兵）原驻南昌训练，后由余维谦旅长调赴吴障岭布防。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所属第三旅旅长赵复祥和第五团长王振群驻德安。第六团长李定魁，有两营驻九江（原五十三标老兵）郭懋修一营驻德安。第四旅旅长蔡森，所属第七团长夏尚声，第八团长余辉，照原驻赣州、吉安。以后第七团调防乐化。混成旅旅长方声涛所属第九团长周壁阶（这团原为九江镇守使戈克安的兵改编），独立营长金其昌驻姑塘。（上面所述的各官长驻在某地，均系包括其部队而言）独立营虽是新成立的一营，但营内军官多系优秀的保定军校及云南讲武堂毕业学生担任，如蒋光鼐、吴艺五、沈静、季方、谢英伯、张廷辅、吴吉甫、林亨佳、杨益谦等，起着一定的骨干作用，战斗力颇强。第十团长李明扬，兼湖口炮台总台长，驻湖口，其兵系湖口炮台台兵改编。

讨袁军队部署尚未停妥，战斗即已陆续展开。先是七月六、七日间，袁世凯派其驻武穴的李纯第六师进攻江西。李纯先派一旅进驻九江、沙河等地，并派军官在沙河测绘地形。林虎将其测绘人员扣留，并于七月十一日拂晓向李纯部队进攻获胜，以后屡战屡胜，先后占领瓜子岭，再占领沙河，给予敌人伤亡很大。（林部扬祖世团，系广东钦廉的老兵，黄兴任南京留守府时，即以该

团为卫队。南京留守取消时，李烈钧将该团调来江西）九江方面，在湖口起义之前，李纯只留了两个营，驻在九江官排甲。当时我方在九江的兵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及所属第六团团长李定魁的两个营，第三团团长伍毓瑞的两个营（第一营早已由营长吴懋松率领开赴南昌，护卫都督府）和何文仪的炮队（四门旧式过山炮）。湖口起义后，赣军与袁军已成敌对形势，两军共处一城，势必引起冲突，欲避免危险，只有趁李纯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以前，迅速将其在九江的两营歼灭，否则我方队伍即宜迅速离开，借以保全实力。当时我看到这个局势，即约请在九江的师长刘世钧、参谋长刘士毅、团长李定魁、都督府顾问张文通，秘密商谈处置目前形势问题。我提出湖口已起义，德安林虎向敌人作战获大胜，我们不能在此作壁上观，应当以第三团两营，加以六团之一营去解决李纯之两营，以李团之一营为预备队，并监视陈庭训的护台营。九江问题解决后，我们即可将部队沿庐山开赴德安，协同林虎进攻李纯部队的侧背，使其腹背受敌，一鼓而歼灭之。大家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并约定次日拂晓前各照计划施行。讵次日李定魁违约，未将队伍开动。我知李有变，即向郑鸣澍、万勋两营长授意，迅速觅好船只，将军队开赴湖口，万一船只不敷，即以一部沿庐山开赴德安待命。万勋系保定军校毕业，九江人，有才干，人眼也熟，所以能够完成任务，将全营士兵乘船撤至湖口。而第二营营长郑鸣澍籍隶河南，人地生疏，动作迟缓，后来遂被敌人缴械。我个人则偕都督府顾问张文通，副官万毅，走到大元洋行暂避。旋由大元洋行经理为我借一艘小汽艇开赴湖口，当即谒见李总司令，报告九江情况。李深为嘉许，命我赶赴姑塘作战，听方旅长声涛指挥。这里必须补叙一笔：李定魁率两

营驻扎九江，早已被袁派其前五十三标之标统（团长）刘槐森到浔勾引，因李系前五十三标的连长，且所部士兵，多是五十三标老兵，就这样，李即被其运动去了。同时李还派人前往德安勾引他驻德安的郭懋修营叛变，幸发觉尚早，郭懋修逃逸，由郭懋仁接替，并未造成大乱，然而兵心已受很大影响。

我到姑塘，谒见右翼指挥官方声涛，方指示了具体敌情和作战方略，即令我赴姑山前线。那时我部第三营万勋营长也奉李总司令命令率所部到达姑山，第一营营长吴懋松亦奉欧阳武都督命，率所部三个连参加姑山作战（其余一连仍驻省城守卫都督府）。姑山在朱桥之后，道通九江，军事上颇为重要。先是第九团周壁阶团长，因率部攻九江，正在阵地以望远镜观察敌情之际，中弹阵亡（周为滇人，云南讲武堂毕业，作战极勇敢），所部士气颇受影响。加之袁世凯又命戈克安派其前团长前来勾引运动，致令该团军心，益形不稳，并有一部分人逃散，方指挥官乃命其开赴南昌整编。

自从第九团撤退后，我以不满一团之兵，御敌一旅之众，当然感到吃力。幸而士气旺盛，工事坚固，又得第十团一部增援，所以敌人屡次冲击，企图夺我阵地均被击退，敌人伤亡很大。炮兵团胡试峰向硖石庙敌人射击，只开了三炮，就伤亡敌兵二百余人。尤其是营长吴懋松，沉着应战，颇称得力。我团在姑山作战，约有十余日，本拟俟机转取攻势，向前推进，嗣因湖口失守，姑山受敌威胁，遂奉命由姑塘乘船向吴城撤退。

湖口为什么失守呢？原因是袁世凯命伪海军部长汤芗铭率领海军，协助进犯。汤为革命党人汤化龙的胞弟。当汤统率海军楚字军舰四艘抵达马当时，诡称是孙中山先生派来助战，马当守军

信以为真，未加阻止。抵达湖口时，李烈钧又因与汤芗铭有旧谊，亦未特别防患。迨海军发炮轰击，乃仓率应战。因为敌人陆海军联合进攻，甚为剧烈，李烈钧自知难于防守，遂撤退吴城。

李到达吴城，先命炮兵营长刘棱扼守望夫亭，复命右翼指挥官方声涛，负责指挥一切。方以吴城北门外之朱矶、吉山颇重要，遂将独立营编为两个支队，以吴艺五为朱矶支队长，林亨佳为吉山支队长，以防守之。当朱矶支队的小火轮被敌艇发现追击时，吉山支队以土炮向敌艇轰击，敌艇遂停止追击。因而朱矶、吉山两支队的小轮，得以脱险，退回吴城。

有一天，敌人以百数十人伪装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乞求入镇。刘棱被其欺骗，未发炮阻止。迨船接近望夫亭时，敌人一跃登陆，开枪攻击，致令我方措手不及。方指挥官虽然发令抵抗，但士兵惊惶之余，已无斗志。李总司令虽加派蔡锐霆团增援，实际上只有两连新兵，战斗力差，吴城遂告失守。

在我团乘船经南康退达吴城时，适吴城沦陷，又奉命退守山下渡。甫将防务布置完毕，李总司令召我谈话，告以南昌紧急，宪兵司令廖伯琅、警察总监阙恩荣有叛变企图。他要先回南昌镇守，命派第一营吴懋松率所部随行，并命我兼程赶回南昌待命。在李总司令抵达南昌时，城门业已关闭，吴懋松乃命连长程钧率士兵搭人梯上城开门，才得入城。先驻都督府，旋移驻德胜门外铜元厂，人心大为安定。次日，我亦率所部赶到，驻都督府，略事布置，即赴铜元厂谒李。李命我为江西陆军独立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命吴懋松为江西陆军独立旅第一团团长，万勋为独立旅第二团团长，将在南昌所有军队重新整编。整编完毕，李命开赴顺化门大校场誓师，并检阅训话。大意要努力杀敌，固守南昌。

军心复为振奋，旋即分别开赴樵舍、市槎防守，并在牛行德胜门一线选择据点，布置第二防线，同时令架设浮桥，以利交通。

江西都督欧阳武，因赴吉安出巡，前南昌卫戍司令廖伯琅护理都督，因通敌关系，畏罪逃匿。某日南昌县商会召集各界士绅开会，推我代理江西都督，我坚辞不获，始行就职。

在我退到山下渡防守时，已知左翼指挥官林虎率部经高安向湖南退却了。右翼指挥官方声涛向广信方面退却了。我抵南昌时，各机关高级官员多已散去。宪兵司令原为廖伯琅兼任，已逃走了。警察总监阎恩荣、兵站总监俞应麓都已离开南昌。只有商会会长曾秉钰、会员傅子清、龚仕材等协助军队，维持市面，将近两旬，军民融洽，全城没有发生抢劫及其他不幸事故，取得地方人民的好感。

其时，南昌尚有夏琇、黄道两个支队。夏支队系以湖南招募的新兵编成（夏系新建人，江西武备学堂毕业），黄支队系以流落在市面的散兵游勇编成（黄亦新建人，日本海军学校毕业，颇有才干）。两个支队，各有五六百人，纪律颇坏，我命其参加前线作战，否则将其解散，以免贻害地方。夏支队长即将部队解散，黄则受廖伯琅暗中怂恿，拒不受命，并以廖为参谋长，开赴抚州、吉、赣一带，沿途骚扰，后由已叛变的旅长蔡森将其拘捕，押解南昌，经李纯把他二人枪决。廖反复无常，得此结果，罪有应得。而黄道因此牺牲殊可叹惜。

时间大约在九月初旬，乐化吃紧，樵舍告急。我部只有四、五营人，半是临时新编队伍，和李纯海陆军万余人作战，众寡悬殊，在弹尽援绝之时，我不得已退守牛行（现昌北）防线，并赴铜元厂谒见李总司令，告以败退情况，并请其先行撤退。李遂率

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邓祖禹等乘轮西驶樟树，经袁州转赴湖南。

我回都督府，商会会长曾秉钰等来见，劝军队不要撤出南昌，以维治安。所有军饷和个人的生命安全，全市商民可以担保等语。我说：维持地方，义不容辞，何况我是南昌县人。但我是个革命军人，决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过我总负责维持到最后时间，保证市面不致发生事故。次日午后，敌炮开始向南昌射击，市面颇形混乱，我即带兵一连向各界巡视，以安人心。并命令各部队傍晚撤退到高等学堂（现八一公园地方）集中，向进贤方向退却。我于八时许同副官胡铨、万毅、钟鼎轩等连同卫队数百人，出永和门向进贤方向撤走。所有卫队经由万毅等妥为遣散，我个人遂由浙赴沪，转往日本亡命。

湖口起义失败后，我被袁政府通辑。其他同志被通辑者有杨赓笙、颜丙临、胡廷銮、陈承志、涂澍霖、黄用中、王镇襄、李儒修等。先后被捕牺牲者徐秀钧、蔡锐霆。被捕入狱者有吴安伯、熊公福、姜伯彰、何犹兴、杨翹新、胡铨等。

先后阵亡者有团长周壁阶、营长谭兴庠、连长应某等。

（三）失败原因

湖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个人观察，大致有如下几点：

1、国民党妥协软弱，内部分裂，意见分歧，且未建立核心领导。在江西发难之后，南方国民党所占据的各省，如江苏、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四川等省，曾先后响应，宣布独立，但上面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策略与统一的指挥。致令各自为

战，步骤不能一致，遂为袁各个击破。

2、南方各省都督，观望迟疑，没有积极作军事上的准备。而袁世凯自宋案发生后，即大借巨款，调遣军队，准备内战，并使用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卑鄙手段，使南方军队多被收买。湖南军械局，亦被袁所派特务加以炸毁。这便让袁在军事上首先取得绝对优越的形势。江西独立以后，黄兴因受党人责难，才赴南京响应独立，仓卒从事，一战了之。其他有关各省，亦无互助协作的精神。如李烈钧电请各处派兵支援，均未积极响应，只有广东派兵一旅，开到南雄撤回，湖南派出徒步兵一团开到宜春，南昌早已失守，均于事实毫无补益。

3、李烈钧匆促返赣，事前既无充分准备，事后计划亦欠周密。把一个讨逆军总司令部，设在前线突出的湖口地方，随时受着敌人海军威胁，甫经交战，湖口即告失守，总司令部后撤，表示神经中枢受到打击。各省援军，迟迟发动，亦是受此影响。特别是本省各部队，在德安败退之后，认为大势已去，左右指挥官分别向袁州、广信撤走，绝无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与决心。

总之，湖口起义，虽告失败，但揭露了袁世凯独裁专制、帝制自为的丑恶面貌，取得了官兵作战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打下了民国五年护国讨袁的胜利基础。失败为成功之母，洵属确论。

讨袁时期“赣军”的具体活动和作用

龚师曾口述遗作 姚肖廉记录

讨袁时期（1913），我在赣军第一师担任参谋长，曾随李烈钧、欧阳武等参加了这次战役。兹就回忆所及，追忆如下。

（一）讨袁前的备战部署

辛亥（1911）革命前，江西新军只有一个混成协（旅），内辖两个步兵标（团），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团（连），一个辎重兵团。武昌起义后，九江、南昌、萍乡先后响应，宣告独立。为了支援北伐，省内各处均尽量扩军。如九江马毓宝标扩充为两个标（标统：刘世均，余鹤松），一个队（队官朱汉涛）。南昌吴介璋所辖一个协扩充为四个标（标统：许炳藜、冯嗣鸿，方先亮为马标标统，蒋群为学生军标标统），后来又有义勇军标（标统：蔡森）。另外还有一个原由上饶调来的巡防营一个营（标统：刘懋政）。萍乡胡谦的一个营扩充为四个营。他如瑞临、饶广、赣南等地，亦有扩充。在全省各地并且有大部份由洪江会转化而来的民团。

李烈钧继任江西都督后，由于袁世凯窃国独裁，谋以武力抵抗，因大事编练军队，作备战准备。袁世凯也知道李烈钧难以就范，从各方面去钳制他。李烈钧原拟在江西编练四个师，袁世凯只答应一个师。李派喻应麟北上交涉，袁又派王芝祥南下斡旋为

二个师。但李仍多编了一个混成旅。师各两旅，旅各两团。最初连各地民团在内，共编过十五个团，最后才缩编为十个团。各团编组情况如下：

第一团、第二团为第一旅旅长林虎的亲信兵。林虎，广西人，其父在江西任官，因得入江西武备学堂肄业，后因拦打官轿被开革，遂回广西任职。辛亥革命后准备率广西钦廉子弟兵北上援宁未果。后经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调到南京编为总统警卫团，并将在沪所购新式军械，悉予配备该团。孙中山辞职后，总统府撤销，由黄任留守，又改为留守府警卫团。李烈钧因与林虎系江西武备学堂同学，又与黄兴同属国民党骨干，因征得黄兴同意，将林虎所部全部调来江西，扩编为第一师第一旅。这旅士兵仍多系钦廉子弟，枪械齐全，战斗力亦强。

第三团系李烈钧从湖北带来的队伍编成。李当九江独立时，曾以九江都督府参谋长名义，率领赣军李明扬、龚永、卓仁机及黄焕章等支队出发援皖，旋又结合皖军吴懋松、郭寿山等部组织皖赣联军援鄂，受任北伐军第二军军长。这次回赣，因将所领在鄂军队编为护卫军，以欧阳武为护卫军司令，下分南雷（欧阳武字）支队，明扬支队，少甫（龚永字）支队，仁机支队，寿山支队、竹青（吴懋松字）支队等。这些军队，大部编入第三团，以伍毓瑞任团长。

第四团初由援鄂复员的赣军组成。原来江西当彭程万任都督时，曾派冯嗣鸿部援鄂，马毓宝任都督时，又电令萍乡胡谦就近派遣了一个支队由周维刚率领，径经湖南入鄂，前往支援。南北停战后，这部分复员军队由李作舟率领回赣，编为第四团。后因该团士兵素质太差，军纪废驰，因予解散。另招新兵，从事组

训，以吴安伯为团长。为区别起见，当时把前者称为老四团，后者为新四团。以上这两个团属第二旅，余维谦任旅长（原任第五十四标教练官）。以上这两个旅为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参谋长龚师曾。

第五团由在九江的刘世均标改编，刘世均因迎李有功，并捕杀了马毓宝的嫡系九江警备司令朱汉涛，升任师长，以王国华任团长。

第六团由在九江的余鹤松标改编，余鹤松调督署顾问，以李定魁任团长。余鹤松本与李烈钧、欧阳武、胡谦为同期同学，也是同时被派留日的江西最早的四个人。余因不拥戴李烈钧，故予调职。这二个团属第三旅，李又新任旅长。

第七团由在南昌的许炳藜标改编，许已离职，由夏之麟（时任江西讲武堂堂长）的侄子夏尚声任团长。

第八团由在南昌的方先亮标改编。方已离职，以余辉照任团长。以上两个团属第四旅，蔡森任旅长。蔡原任义勇军标标统，后方先亮就任马毓宝的军务厅长，所有马标亦由蔡率领。

以上这两个旅为第二师，师长刘世均，参谋长徐定青。

第九团由九江原朱汉涛部下九江镇守使戈克安的部队改编，戈被撤职，以周璧阶任团长。

第十团由内河水师及长江水师改编。内河水师在前清同治年间归刘于得统领。长江水师由彭玉麟统领。入民国后合编为水警总队，由蔡锐霆率领，调到湖口集训，叫做调训团，现改编为第十团，由湖口总台官李明扬兼任团长。

以上两团属独立混成旅，旅长方声涛。该旅除两个团以外，还有炮兵第一营（营长杨益谦），独立第一营（营长段德华）及

新兵第一营（营长金其昌）等部队。

第一师尚辖有炮兵一团，由原炮兵营扩编，团长文锡宸，李并派江西垦务督办（驻庐山）孙岳以七万元向西北购马补充。

从系统来说，第一师系李烈钧自己统率的队伍，第二师系原在省境内南昌九江两部份的队伍，独立旅则系新收编的队伍。至于原来由洪江会会众转化而来的民团，则悉予解散。

李烈钧编练这么多的军队，其官佐士兵的枪枝器械，粮饷装备从何而来呢？需要加以具体说明。

兵源方面，由于孙中山唤起民众，驱逐鞑虏，群众民族意识大大提高，学生、工人纷纷报名参军，所以兵源甚旺，惟官佐方面比较缺乏。前经吴介璋将陆军小学及陆军测绘学堂两校暂行停办，把两校学生，用陆军小学校址，开办江西陆军速成学校，不分兵种，以六个月结业，仍不敷用。李烈钧又就速成学校原址，开办江西讲武堂，分将校、学生、军士三个班，一年毕业。将校班抽调各团营的连排长入学，名额五十人；学生班招收中学学生五十名，这就是排长后补人；军士班由各团营挑选士兵一百名，训练基层干部。

军械方面，当革命后将军械库所藏自太平天国以来陆续向各国采购的枪枝，一并取出应用，惟枪型不一，有德国造，有奥国造，有俄国造，有英国造，有日本造……其中又有三十年式、三八式、村田式。本国自制的又有汉阳造，上海造等种。但大部分都是单响毛瑟、前膛枪、林明敦等。九江光复后，曾向海军取得了马克沁机关枪若干挺。吴介璋的军务厅厅长朱寿同派朱××亲赴上海采购军械。李烈钧回赣时，曾截获朱汉涛由外国购来的步枪及法国式旱机关枪多挺，又向广西新军王芝祥部借得奥国式水

筒机关枪多挺。李烈钧的军务司司长喻应麟也曾向上海洋行订购了不少军械，有一次二千枝。一度为袁世凯所勾引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所扣留，经交涉仍予发还使用。

粮饷方面，当南昌光复时，藩库尚存纹银二百万两，马毓宝悉用以扩充军队及组织民团。李烈钧接事后，引用英国留学生徐秀钧为财政顾问，先后开办江西民国银行，发行钞票，开办开元公典，发行花票；并截收盐敛、盐税，后二种并不列入省预算决算，不受财政司的监督和省议会的审核。如林虎的警卫团由宁来赣时，一次即拨付开拔费十万元。援鄂复员的赣军，其复员费亦由江西支援。李烈钧手面又大，财源亦广，所以对军队的粮饷，亦不虞竭蹶。

在李烈钧整军经武的形势下，袁世凯也步步进逼。但在其任命民政长（汪瑞闿），策动（余鹤松）政变，扣留军械（李从日本购入）勾引内奸（戈克安）等阴谋先后失败后，即准备用武力镇压，遂派第六镇李纯部进驻鄂、赣交界的兴国州，监视江西；第二镇王占元部进驻汉口，兼防黎元洪，并派四、五两镇由冯国璋指挥，沿京浦路南下，协助在兖州的张勋部；又令倪嗣冲编好皖军二十营，驻扎阜阳，对江西采取包围形势。李亦不甘示弱，立即调兵遣将，以资对付。当即调原驻赣南的第四旅蔡森部七、八两团，驻萍乡的第六团李定魁部，驻九江的第九团周壁阶部，驻湖口的第一旅林虎部一、二两团开驻瑞昌，第三团伍毓瑞部开驻德安，炮兵第一团刘棱部开驻永修，准备作战。仅第四团、第五团留驻省会南昌。第十团长李明扬驻湖口，其兵系湖口的炮台兵改编，李兼湖口炮台总台长。独立营虽系新成立的，战斗力亦强，驻姑塘。第一师及混成旅均设司令部于九江。一九一三年一

月，欧阳武派参谋长龚师曾会同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由长江沿江直上，并曾化装到湖北武穴（瑞昌对岸）察看地形，绘画略图，部署作战。三月，又派参谋长龚师曾化装潜入安徽望江（湖口对岸）侦察敌情。

（二）起义后的战斗经过

1913年六月九日，袁世凯部署已定，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派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李烈钧当时考虑：如果立即发动讨袁，有为权位而战之嫌，世人或不见谅。因乘小轮到湖口，转乘日清公司凤阳丸离职去沪。李离职后，欧阳武即将第一师司令部迁回南昌，就了护军使职务，后更奉黎兼都督电令，代行江西都督职权，第一师师长由参谋长龚师曾代行。

李烈钧到达上海后，即与孙中山先生积极商议讨袁计划。会上孙中山先生谈到由那省先行发动问题，大家都默不作声，独李烈钧起立发言，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讨袁主张，并自告奋勇，愿由江西首先发难。于是大家公推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会后，李即返湖口发动起义。

李烈钧于七月七日到达湖口后，即着手编配军队，拟定作战计划，召集各部队首长开军事会议，面授机宜。李烈钧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兼正面军总司令，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原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参谋长，省议员杨赓笙为秘书。拟撰讨袁檄文，于七月十日宣布独立。并将在九江拿获的由黎元洪派来赉送江西护军使印

信的余大鸿，解到湖口杀头祭旗。

李烈钧回到湖口的消息传到南昌后，欧阳武即派军务厅厅长俞应农赴湖口向李请示。俞回南昌后，欧阳武即召集全省机关首长，省议会全体议员以及各党派各团体的负责人，在夫人殿总商会内举行讨袁大会，当场决定一致签名通电讨伐袁世凯，推定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俞应农为兵站总监，于七月十二日宣布江西独立。

当时的形势是：林虎所部第一团苏世安，第二团杨祖时（新兵）布防在德安、瑞昌之间。三团伍毓瑞的二、三两营在九江，第一营在南昌护卫都督府。四团、五团先驻南昌，后来也由欧阳武派到德安吴障岭等地布防。六团李定魁有二营在九江，一营在德安。七团夏尚声新由赣州开到前线。八团余辉照部尚迟迟未发。九团周壁阶及独立营金其昌部在姑塘。第十团李明扬部两营在姑塘，一营在湖口。炮兵第一团刘棱部在永修。作战计划系由林虎指挥一、二、七三个团攻击在十里铺的北军。方声涛指挥三、九、十三个团攻击在九江城南的北军。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十团的一营和水师。

九江方面，在湖口起义之前，李纯派了两个营驻在九江。当时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均及第六团李定魁的两个营，何文沂的炮队（四门旧式过山炮），第三团伍毓瑞的两个营，均驻九江。伍毓瑞原拟商承师长刘世均，参谋长刘士毅，都督顾问张文通会同李定魁，以第三团的两营加以第六团的一营，去解决李纯的两个营，以一营为预备队监视陈庭训的护台营。在李纯部队解决后，即率部沿庐山开赴德安，协同林虎攻击李纯的侧后背，使其腹背受敌。讵意李定魁屡约屡爽，原来李已被前五十三标标长刘槐森勾

引叛变了（李系前五十三标连长，所部亦五十三标老兵）。伍毓瑞情知有变，偕顾问张文通、副官万毅避入日商大元洋行，并代雇小汽艇潜赴湖口，所部两个营，第三营全面撤退，第二营被缴械。师长刘世均既不甘与李定魁合污，又不曾同伍毓瑞出走，几遭拘留，后有人引往江北，始克逃脱。李定魁尚有郭懋修一营驻在德安，李亦派人勾引，因这一营是五十四标的底子，即被发觉，郭懋修潜逃，始行稳定。

德安方面，林虎已率部进驻沙河，距北军只有九里。七月十二日拂晓发动攻击，由于士气旺盛，军械齐全，兼以地形稔熟，战至十点左右，敌被击溃，退至赛湖附近，我军占领瓜子岭。林虎素有“飞将军”之称，其钦廉子弟兵又多骁勇善战，并赤膊上阵，故在初期能屡战屡胜。迨七月二十一日袁世凯下“讨伐令”后，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率李纯、马继增等部进攻九江，并勾引李定魁叛变，军心动摇，遂转胜为败。林虎在前线失利后，带领部队经由德安、永修、奉新、修水方面撤退，开入湖南，将军械，弹药及一切装备交给湖南都督谭延闿。谭给他银元十万元，作为解散部队之用，林即乘坐日本军舰直到日本去了。

姑塘方面，战斗指挥官是方声涛，第一线攻击指挥官是第九团周壁阶，后备队指挥官是机关枪队卓仁机，从姑塘进攻北军九江城东面的兵力。从姑塘进攻的部队，因水路木船运输困难，赶不及在十二日同时拂晓进攻，到十三日夜间始进入阵地。十四日拂晓进攻，团长周壁阶为了鼓励士气，戴着金边军帽、金领章，挂着参谋带，手拿着雪亮反光的指挥刀，带着队伍在阵地上猛冲。因为这一团也是新编的（接编戈克安所部），他有意带动士兵进攻，不料为敌人发现目标，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当他站起来

拿着指挥刀指向敌人叫喊前进的时候，飞来一弹，打掉了他的指挥刀，穿过了他的心脏。士兵把他抬下来，便已停止了呼吸。因为团长阵亡，影响军心，队伍内就被陈庭训收买的好细带领一大部份人绕侧路走到金鸡坡炮台投降敌人去了。幸由第三团长伍毓瑞指挥从九江撤回的第三营万勋部，结合原驻南昌新由欧阳武派来增援的第一营吴懋松部（仍留一连守卫都督府）并独立营参加作战，始告稳定。在姑塘作战十余日，本拟候机转取攻势，向前推进。嗣因湖口沦陷，奉命向吴城撤退，又因吴城失守，遂未入城而退守山下渡。方声涛旅长则率独立营向广信方面退却。

湖口方面，由守备司令何子奇指挥作战。担任从湖口下游的马当炮台一带防御的是李明扬第十团。西炮台由于姑塘的攻击失败，被敌人水陆夹攻，已先失守。湖口这方面的东炮台是何子奇自己指挥开炮和敌人兵舰作战。先是，袁世凯下令“讨伐”时，曾令郑汝成、汤芗铭率领海军助战。至时，汤芗铭率楚字军舰四艘抵达马当，诡称中山先生派来助战，马当守军遂未加阻止。抵达湖口时，李烈钧又因与汤芗铭有旧谊，亦未加戒备。迨海军发炮轰击，始仓皇应战。炮台上的大炮，都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克鲁伯厂所制造的后膛大炮，口径十二寸的，火药量六角式，有蜂窝眼，像大号棋子那么大，年龄总有六、七十年，射程一万多米达，难以制胜。敌人的步兵又在下游十多里的地方“扎基”登陆，我军有两个机关枪连在那里防御，但江面太长，阻挡不住，加上马当炮台下也起了内变，驻台营长被赶走，只有放弃湖口，向吴城撤退。李烈钧命炮兵营长刘棱扼守望夫亭。敌人以百数十人伪装难民，乘民船数艘，乞求入镇。刘棱受其骗未发炮阻止，迨船得近岸，即蜂踊登陆，并发枪攻击，我方措手不及，吴城又

告失守。我军遂亦登舟撤退山下渡，与姑塘撤退之兵会合。

这时，第一旅林虎所部一、二两个团因右翼联军已撤退，陷于孤军突出作战，形势不利，乃亦撤退湖南。第二旅长余维谦，第三旅长赵又新不知去向。所部第三团在山下渡勉维难局。第四、第五两团新兵，不打自溃。第六团李定魁叛变投降。第四旅蔡森所部尚在赣州，后亦投降北军。独立旅长方声涛率独立营退上饶，转入福建。第九团因团长阵亡溃败。第十团在湖口败北。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的战斗就此失败。喧赫一时的赣军也就此瓦解了。

(三) 讨袁的最后结局

李烈钧于九江、湖口先后失守后，乃于八月下旬下令作战部队，退抵永修山下渡南岸及新建吴城，都昌姑塘，南昌王家渡等处。此时，南昌当局即召开秘密会议。欧阳武认为这次战斗，国民党没有统一的指挥，独立各省仅以空电支援，按兵不动，单靠我一省的兵力决难以抵抗拥有强大兵力的袁世凯，固守南昌，背城作战，徒使地方糜烂，人民遭殃，遂决定将第一师司令部撤退到吉安。军次樟树时，欧阳武又宣称：“我是吉安人，既不愿在南昌作战，破坏地方，使人民痛苦，更不愿以桑梓作战场，使我留万古骂名。”遂决定不再参加作战，赠送参谋长龚师曾五百元，给资解散幕僚，自携幕友中的乡亲回到吉安，入青原山为僧，改名止戈和尚（武字拆开为止戈二字）。

李烈钧自吴城、姑塘失守后，右翼各军退至建昌（现永修）左翼各军退至乐化，于山下渡至樵舍一线设防，自设司令部于南昌北门外的轮船上。这时，欧阳武已撤退，南昌宪兵司令廖伯

娘和警察总监阎恩荣有叛变企图，乃命伍毓瑞率吴懋松营兼程赶回南昌。李烈钧抵南昌时，城门紧闭，不得入城，乃命士兵越城而上，始得入城。李先驻都督府，后驻德胜门外的铜元厂，并委任伍毓瑞为江西陆军独立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吴懋松为该旅第一团团长，万勋为第二团团长，并整编南昌所有军队。这时，江西省政负责无人，江西省绅商各界公推伍毓瑞代理都督，省商会会长曾秉钰，会员龚士材、傅子清等协助维持市面，军民皆安。南昌附近原有欧阳武都督临时编组的夏琛、黄道两个支队，纪律较坏，亦经伍分令遣散。黄支队因受廖伯娘的怂恿，将队伍开赴抚州、赣州一带，以廖为参谋长。后两人悉被虞兴魁（原余鹤松部团长，与李定魁同僚）拘捕，送由李纯处决。

约在九月上旬，樵舍告急，乐化第七团已溃败，王家渡被敌舰占领，牛行也闻炮声。我方岸上的军队群向南昌城南奔跑，河中船只大都开往上游，总司令部的小轮船亦载李烈钧率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邓祖禹（轮船管带）等经樟树到袁州，再由安源乘火车到长沙，晤湖南都督谭延闿。由谭代定日轮武陵丸到汉口，在刘家桥密乘日本野村军舰到大冶，然后换乘铁赴日的轮船，出吴淞口，过黄海至日本门司上岸到东京。李烈钧把南昌商会送给他的八万大洋安顿了流亡的部属。伍毓瑞在南昌命令吴、万两团撤至高等学堂（今八一公园）集合向进贤退却，后予以解散。伍亦率副官胡璇、万毅、钟少轩等由浙赴沪，转赴日本亡命。

是役也，袁世凯除把李烈钧作为“乱党”主谋外，并根据黎元洪报告，认为在湖口作乱的罪魁有七个人，即林虎、方声涛、何子奇、李明扬、蔡锐霆、卓仁机、周壁阶，着北京检察厅起诉缉办。事后同案被通缉的还有杨赓笙、颜丙临、胡廷鑑、陈承

志、涂树霖、黄用中、王镇寰、李儒修等。被捕牺牲的有徐秀钧、蔡锐霆。被捕入狱的有吴安伯、熊公福、姜伯彰、何犹兴、杨翹新、胡硃等。欧阳武以亲老家贫，祖父年逾八十，恐有株连，因投案自首，由吉安警察局长虞兴魁押送南昌。转解北京军事法庭判刑八年，后来又予以“特赦”释放了。

（四）二次革命所起的作用和失败的原因

讨袁之役，发生在1913年，即民国二年癸丑，有人称为癸丑革命，或叫二次革命。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辛亥革命这一果实，很快被封建官僚和军阀袁世凯掠夺而去。那时大家认为只要把满清王朝推翻了，便万事大吉，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时孙中山先生甚至愿屈就由袁世凯委任的“全国铁路督办”，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和衷共济。等到发觉袁有帝制独裁野心，发动武力抵抗的时候，内部意见也不集中，有关各省起义的步调又不一致，陷入了被动，只是打了一场无准备的仗，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原因当然是几方面的。

首先是没有发动群众，二次革命之起，湖口以七月十二日发难，江苏十五日响应，广东十八日响应，福建二十日响应，湖南二十五日响应，四川八月四日响应。苏之响应，迫于黄兴；湘之响应，迫于谭人风，皆十分勉强。而且福建、湖南取消独立，又先于李纯之入南昌。芜湖、安庆之响应，又后于江苏，致皖、赣不能收指臂之助。国民党四督（赣李烈钧、皖柏文蔚、湘潭延闿、粤胡汉民。），只有李烈钧孤军作战，并没有群众基础，此其一。

其次，从赣军内部来讲，也不是那么巩固的。战前，有刘槐森勾引李定魁叛变，战时，周壁阶团长阵亡，所属戈克安旧部又相率逃亡。第四旅蔡森在赣州按兵不动，迟不赴援。两个师长当时摇摆不定。第三旅长亦临阵不前。只有林虎所部掩杀了一阵。方声涛和伍毓瑞等勉维了残局。何况军械不全，型号各异，弹药补给不合膛口，不但不能济用，反而成了负担。又有几个团新兵，不战自溃，所以无论是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处于不利之局，此其二。

再其次，在领导艺术上来讲，也是不统一的。当时在沪商议讨袁时，意见就未集中。李烈钧自告奋勇，愿意首先发难，被推为讨袁总司令，以这个名义来指挥全国讨袁军的队伍。迨后黄兴就任南京讨袁总司令，胡汉民就任广东讨袁总司令，谭延闿就任湖南讨袁总司令，李对黄兴素来尊重，也不便指挥胡汉民和谭延闿，因此自行退居江西讨袁军总司令，这样就显得群龙无首，不能收统一指挥之效。本来大家一致电上海请孙中山先生出任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以总其成，孙中山先生复电不允。后又计议电请岑春煊出任大元帅。岑在前清做过督抚，与袁世凯不睦，同情国民党，有意出来担任，但此人官僚架子十足，没有革命锐气，起初故示谦让，后闻战事失利，索性辞不应命。这样，就陷入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的局面，终至以全面失败而告终。此其三。

虽然如此，二次革命到底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再度斗争，反映了全国人民于民族革命以外争取民主革命的愿望，也为后来的护国讨袁提供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为后来的彻底讨袁准备了条件。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和反动派决不能“和平共处”，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取得彻底革命的胜利。

湖口起义亲历记

张岂庸 遗作

继辛亥革命之后，1913年（癸丑）由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有借五国银行团二千五百万磅的债款，引起当时国民党方面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于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方面的各省都督，如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程德全等举行会议。当决定联合举兵讨伐袁世凯。并由李烈钧首先在湖口起义，宣布独立。这亦称为第二次革命。

当时我担任湖口守备司令部副官兼卫队连连长，后又代理过东炮台台长。现就当时在湖口见闻所及，略记如下。

湖口踞外江内湖之间，形势雄胜，向为军家所必争。李烈钧在起义时，设立守备军司令部于此。以何子奇为司令，邓文翠为副司令。何系江苏人，日本宪兵学校出身。邓为江西，日本东斌学校出身，同盟会员。其时，起义军的兵力：在湖口方面只有调练团一团，系由水上巡防营改编，团长余邦宪，江西人，日本东斌学校出身。该团所用枪枝是俄国九响的步枪。另东西炮台两座，共有前膛炮十余门，系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时所遗留下来的。又炮舰二十余艘，每艘配有土炮一门。其余大部兵力如欧阳武的第一师，刘世钧的第二师和刘凌的炮兵团等，则配置在瑞昌和沙河、黄老门、德安、永修等沿南浔铁路线上。

当时李烈钧为了扩充军队，需用军事干部，并曾派其亲信徐秀钧（九江人，当时在北京任众议员）携款到保定，接济本省在

保定军校学习的学生，令其回赣，大家热气腾腾，秘密请假南下参加革命。我即其中的一人。回赣后，我被派任湖口守备军司令部副官兼卫队连连长，因此参加了这次战役。

战事开始，湖口首先遭受敌兵舰袭击，炮轰猛烈，全城人心惶惶。时敌兵舰泊靠长江北岸，距离我炮台较远，而我炮台又均系前膛老炮，回击既不准确，射程也达不到目标。

其时，我奉命到东炮台巡察，见附近落弹两处，炸成深坑，台兵被炸伤两名，台长（忘其姓名，安徽人，行伍出身）向我请求撤退，说：“敌舰炮火利害，弹击准确，实在不能再守了。”并请我离开炮台，免遭危险。我未允准。

一天下午，敌兵舰一艘，从上游驶来，舰上悬有白旗。于是司令部雀噪起来，说敌人兵舰来投降，赶快派人去欢迎。当由副官长龚少甫（福建人，海军学校出身）和我带领士兵数人，乘一小火轮驶去，行至中途，见其扬长而去，过湖口并不停留。才知其悬白旗，乃是诈降，企图闯关。我们乃一场空喜而返。

在九江方面，由于袁世凯所派的李纯第六师、陈光远第×师和马继曾的第一师猛攻九江，鏖战多日，死亡枕籍，前线渐现不支。李烈钧乃下令撤至德安、永修、星子、都昌、波阳一线。由于邻省援兵不至，而安徽、湖南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于是湖口起义，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

根据个人不正确、不全面的体会，湖口起义失败如此迅速，其原因大概有三：

1、发动匆匆，准备不足，且无全国性的全盘计划。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湖口起义恰恰与此

相反，不但无准备，而且无把握。同时听说当时的南京留守兴黄，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意见也不一致，因此没有整个统一的决策。这是失败最大的原因。

2、敌我兵力悬殊。江西省从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不久，改编和新募的两师兵力，训练不足，装备又不完善，以当北洋军阀号称劲旅的第一师，第六师，第×师，加之海军舰队，力量悬殊太大。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袁世凯企图速战速决，各个击破，而我则企图孤守，以硬碰硬，当然要遭到失败。

3、各省观望不定，缺乏统一行动。当时湖口义旗一举，全国人心本极振奋，如果苏、皖、湘、粤、川、闽各省都督能如响应斯应，互相出兵增援，或另辟战场，扩大革命声势，分散敌人兵力，从容应变，联合作战，则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但与此相反，国民党方面的各省都督，心志未坚，怀疑观望，等到袁世凯下令免其都督职，始欲积极起来，剑及履及，盖已晚矣！

石 钟 山 今 昔

袁 作

石钟山位于湖口县治双钟镇。有上、下石钟山之分。南唐名大钟石。宋名钟子矶，又名南钟石，北钟石。上钟石，下钟石。上钟矶，下钟矶。又合称双钟石。两山都是由石炭系的石灰岩构成。

湖口县以位于鄱阳湖之口而得名。是江西省最北端县之一。与安徽省的宿松县和湖北省的黄梅县隔江相望。

双钟镇因上、下石钟山而得名。位于县境西北角。两山对峙，地势险要，风景优美。而下石钟山更为著名。

石钟山的得名，最早出自汉代桑钦所著《水经》中所载：“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北魏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是深潭，轻微的风，鼓起层层波浪，冲击着深潭上面的穴缝和石块，因而发出像洪钟一样的声音来。唐代李渤访其遗迹，在深潭上面，找到两块石头，他敲击着，听它发出的声音，南面的石头，声音厚重而模糊；北面的石头，声音清脆而高亢，敲击停止了，声音还在响。他便认为石钟山的得名，是由此而来的。宋代苏东坡，对郦道元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他对李渤的说法，感到更不可信。他说：“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于是，他在一个月明的晚上，和他的儿子苏迈一道，乘坐一条小船，泊于绝壁之下，对石钟山进行了一次实地探访，考究。

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石钟山记》。这篇文章，广为传诵，至今仍被选用为大、中学教材。除了写作技巧外，更主要的在于提出了一个至今可资借鉴的主题：“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就是说，在一切事物中，要重调查研究与证据，不能单凭主观猜想，妄断是非。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以声定名。到了清代，有人认为石钟山上锐下宽，如钟复地，主张以形定名。其实声与形，皆有其道理和依据。

还有一种民间流传的“天落双钟”的神话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玉皇大帝建造了一座灵霄宝殿，一切装饰就绪，还缺少两口钟，于是传旨太白金星监造。太白金星遍访了天上人间的神工巧匠，并从九华山选择了最优良的玉石，作为造钟的原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两口白玉石钟，终于制造成功。玉帝传旨太白金星，在八月十五日这个黄道吉日，把钟运往灵霄宝殿。太白金星领旨后，立即传令大象力士，前往九华山取钟，并限定当晚赶回天庭。

大象力士来到九华山，只见两口白玉石钟晶莹明亮，在苍松翠柏之中，和着山风，铮铮作响。他围着这两口石钟，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又用手撼了撼，在心里盘算了一会，便扎紧腰巾，挽起袖子，运足了力气，猛然嗨的一声，便把白玉石钟抱了起来，试了一试，仍放在原处。他面对这两口钟，凝神思索，应该怎么拿法。他用眼向四周一望，只见百步开外的地方，有一株十余丈高的椿树，立杆笔直，树身粗壮，正好用作挑钟扁担。便快步上前，用力把椿树连根拔起，剔除枝丫树蔸，托在手里掂了一掂，才安进钟环，挑起就走。

大象力士挑起两口石钟，两腿生风般的往前赶路，只跑得汗流浃背。他撩起葛布长衣擦擦汗，不换肩，不停步，一心想尽快赶回天庭。当他来到鄱阳湖上空，已是红日衔山，一道道彩霞，映照着鄱阳湖水，微波荡漾，金碧辉煌。他看着、看着，忽然发现湖中有一座鞋形小山，山上古塔高耸，百花飘香，花间站着一位窈窕淑女，身穿绛红花裙，肩披杏黄绸带，头插玉钗金凤，耳垂翡翠银环。只见她含情脉脉，貌胜天仙。大象力士从来没见过这样漂亮女子，他看得入神，不觉金鸟西坠，玉兔东升，大象力士心里着急，加快步伐，觉得肩上担子沉重，心想换一换肩，他把肩膀一颠，不料扁担一弯，两口白玉石钟从扁担头上溜了下来，带着风往下落去，“轰”的一声巨响，激起万丈高的水柱，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鄱阳湖口，长江之滨，变成两座精巧玲珑的石山，一座在南，一座在北，就是现在的上、下石钟山。

石钟山历史悠久。从汉代起就有建筑。由于历代战火摧残，几经兴废。现有建筑，都是清代重建的。山上面积虽然不大，由于劳动人民园林建筑的合理布局，楼台亭阁，因势构筑。墙廊庭院，曲折迂回。显得处处通幽，别有佳境。主要风景名胜有：纪念晋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归去亭”；怀念苏东坡的“坡仙楼”、“怀苏亭”，面临长江，风景优美的“船厅”、“江天一览亭”；奇石突兀的“矶头”；境地幽峭的“浣香别墅”；巉峻嶙峋的“桃花洞”；巍然屹立的“天灯塔”、“锁江塔”；巉岩侧立的“泛舟崖”；江湖汇合的“黄赤界”；历史遗址“英雄石”；革命遗址“太平遗垒”以及艺术塑雕“海岛”等三十余处。还有许多名人字碑、石刻。其中唐代魏征手书石刻，列入省重点保护文物。

石钟山自然风光，得天独厚。有山有水，有江有湖。视野瞬息多姿，景物四时各异。自古以来，成为游览胜地。凭栏眺望，匡庐五老，如拱如揖，秀丽挺拔，鄱湖长江，烟波浩渺，清浊分明。渔歌互答，帆影翩翩。如果乘小舟泛游于山麓，则气势又有不同。陡峭巉岩，凌空直下，令人不敢仰视。岩上枯藤秃树，像龙爪一样，伸展空际。伸入水中的岩石，被波涛拍打得玲珑透剔，一行行穴缝迎水而开，里面幽邃曲折，深不可测。山色水光，吸引着历代许多骚人墨客，到此游览。如晋朝的陶渊明，刘宋时的谢灵运，唐朝的李白、张九龄、白居易、颜真卿，宋朝的苏轼、黄庭坚、陆游、文天祥，元朝的吴澄，明朝的朱元璋、解缙，清朝的蒋士铨、袁枚等，都曾到此，题词留念，作诗纪游。在这些诗词中，有许多警句，令人百读不厌。如描写石钟山的有“对影疑双阙，孤生若断云。”“崖成二鸟翼，峰作一芙莲。”“悬崖老石苍龙色，嵯峨高枕江流碧。”“凌空险峭千重山，杆地玲珑百态生。”“立脚怕随流水去，回身恍惹白云牵。”写远景的有“五老云中出，九江天际来。”“窗悬庐阜千寻瀑，门拥鄱湖万里舟。”“秋水接长天，万里共一色。”描写风景的有：“云静山浮翠，风高浪拨银。”“云雾气蒸迷日月，波涛声撼震乾坤。”“怒鳞云鬣奔腾来，眩目快心千样好。”描写雨景的有“返景照疏雨，轻烟淡远空。”描写晚景的有：“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云垂苍崖深，日出湖水动。”描写江湖合流的有：“九江流与鄱湖接，清浊分明见一痕。”……。

一九六五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到此，写了一首《登湖口石钟山》诗，这首诗的手写体，珍藏在石钟山文物管理所，收入《沫若诗词选》扉页。

诗曰：偶至石钟山，江天一望宽。水文黄赤界，峰影有无间。

日寇沉人岬，湘顽败阵关。太平遗垒在，党校耀人寰。

同年，魏文伯同志到此，也写了一首“湖口石钟山”诗。

诗曰：南望庐山秀，回峰枕双流。石钟船厅上，江湖一目收。

清浊分流处，绿绿扁担洲。千帆竞风走，不为湖口留。

下石钟山下，还有一石洞。据《石钟山志》记载：洞门濒江倚湖，冬季潮落，则门出焉。透漏玲珑，莫可言状。蜿蜒行，劣始如枯龙，蛤满峭壁，俨然鳞甲，左右旁通，上下数叠，曲折宽敞，可容千人。最上层，烛而登，平坦温暖，老蝠如扇。石峡有子洞，蛇而入，复高广。三人可坐，“丹房”二字题于壁。旁歧多小诗，均新奇可喜。如“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尘世无人识。”又如：“小憩千年人不识，桃花春涨洞门关。”等句。……墨色暗淡，惜无年代可考。……

洞内曲折左旋，由岐径侧身逼入，行数十武，微漏天光，行回过石峡一带，奇葩异草，莫名其妙。见泥印大足迹数处。再进忽暗，以火烛之，至一处，有天然石屋三间，中敞若厅，左一间，羊豕，蹄甲，禽鸟，翅爪，狼籍满地。右则净无纤尘，上悬白石棺一具，以辘轳穿系石窟，棺盖亦白石者，另悬于旁。石壁有字，略可辨论者：“赤脚僧……年修行于此”八字。年字上有几字漶减。（赤脚僧姓况，清名觉显，湖口人，始修行于武山白云洞）壁间，有诗一首。

诗曰：借骑白鹿出庐山，自笑心闲身未闲。

跣足难寻乾净土，红尘游遍十年还。

湖口县治，滨临大江，地当险要，上通楚北，下达皖南，为七省之通衢，实三江之门户。上下石钟山，拱卫在县治南北两端。两山夹峙，岸石巉岩，江汉合流，湍回浪急。号称“江湖锁钥”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后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东吴孙策，屯兵于此，大破庐江太守刘勋。十三年，（公元208年）吴大将周瑜操练水军于鄱阳湖，会曹操拥兵八十余万，破荆州，下江陵。周瑜由此进兵赤壁，大破曹兵。

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毅大将何无忌，大破桓元兵于此。

南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江州刺史臧质举兵反。宋主遣兵讨质，追至湖口，质以荷叶复头，藏于水中，被宋军发现，以箭射之中心，复以乱刃刺之，肠胃缠萦于水草。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隋将刘子翌，在这里为操师乞大将林士宏败死。

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李成叛据江淮（当时湖口属江淮路）宋将吕颐浩，遣兵击李成于湖口，败之。

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湖，这里经常是战船出没之所。公元一三六三年七月，在一次激战中，朱元璋为陈友谅所败，舟行至上石钟山附近，在沙滩搁浅，陈友谅骁将张定边趁机猛扑朱元璋舟，情况十分危急，于是，朱元璋牙将韩成，急中生智，当即换上朱元璋所穿戴的衣帽，假扮朱元璋投水自尽。陈友谅军误以为朱元璋投水死。这时，张定边又为朱元璋大将常遇春放箭从旁射中，因此，陈友谅军进攻稍缓。随后，陈友谅军再次追来，常遇春站立船头，怒目横枪，大喝一声，随手用枪挑起一

块巨石，向陈友谅砸去，陈友谅军见常遇春这般勇猛，吓得不敢上前，朱元璋因此得以脱险。至今上石钟山麓，还有一块屹立在水中的岩石，岩石上有一块巨石，名叫“英雄石”，巨石上还留存着枪戳的痕迹，相传为常遇春用枪挑放于此。一三六三年八月，陈友谅在下石钟山附近的泾江口，为朱元璋所败，于乱战中，被朱元璋军飞箭射中头颅，贯睛而死。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军，在这里驻守了近五年之久（公元1853——1857年），守将黄文金（后封堵王）拆毁旧城，在石钟山自麓至顶，重石叠关，筑城如带。复在西岸梅家洲，筑立坚城，掘濠植树，环濠绿杨几万株，葱郁成林，与湖口相犄角，防御工事极固，文金镇守三年，与清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战，杀清将肖捷三（清水师提督）、罗胜发、史久立等。敌人极怕他，叫他黄老虎。太平军在湖口与清军最著名的一次战斗，为一八五五年一月之战。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军定都天京（即南京），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形势，夺取长江中下游地区，掌握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据点，作为天京的屏障。五月，由大将胡以晃（后封豫王）、罗大纲、赖汉英等，统领战船千余艘，溯江西征。六月下安庆，克湖口，九月占领九江，十月进攻汉口、汉阳。清政府为了争夺江防，慌忙命令曾国藩在湖南建立湘军水师，前来阻击太平军。一八五四年秋，太平军武昌失守，接着在田家镇大败。曾国藩率领的地主武装，分水陆两路，从湖南岳州，一直反攻到江西九江。天王洪秀全，急命翼王石达开督军赴援，大战即于湖口到九江的江面上展开。

石达开到达湖口时，湘军水师已越过九江来犯，达开率领众

将领，登高远窥敌情。见湘军水师，船制严整。以快蟹、长龙大船居中指挥，舢舨、轻舟往来作战，装备是相当好的。用的武器是洋枪火炮。面对这些强大的敌人，太平军中有的将领有畏难情绪。石达开却看出了敌人不足的一面。因为快蟹、长龙船制笨重，难以移动，必须与舢舨轻舟相依护，才能发挥作用。而冲锋荡决，必须由舢舨担任。如果能把舢舨与长龙隔离，当可取胜。湘军自出长沙，转战千里，连陷岳州、武昌，侥幸屡获大胜，没有得到休息。屡胜就会骄傲，久战就会疲劳，骄则轻敌，疲则易乘，骄与疲都是败象。石达开考虑到硬打还是不行的，必须智取。于是，定下了一条破敌的计谋。

石达开自驻湖口指挥，分兵扼守小池口，与九江相犄角，复命罗大纲驻守湖口对岸梅家洲，大纲率领军民，加固原有防线。把树桩绕营钉两排，中间填入土石，筑成土城，城上设炮台，百余门大炮，虎视江面，象一把把铁钳，钳住湖口。城外再挖濠沟数道，濠沟以外，又遍布木桩竹签。宽约十余丈，并从石钟山到梅家洲的水面上，横起几根粗大的铁索，铁索两旁，用木船扎了两道浮桥，沟通两岸，辅助铁索，于是一道坚固的水卡，把鄱阳湖通往长江的隘口封锁起来。

水卡设置后，太平军故意坚壁高垒，不和敌人决战，每夜派兵沿长江两岸，鸣鼓震天，密集火箭，射向敌船。同时在江中派小艇用火球四面抛掷。湘军夜夜受到惊扰，惶恐不安。这样，相持一个多月，湘军疲劳更甚，而求战愈急。曾国藩命水师提督肖捷三，率领许多轻便战船，向湖口猛冲，第一次没有攻下，几天以后，又来进攻，太平军却有意放开水卡，肖捷三得意忘形地率领许多舢舨轻舟，往鄱阳湖里窜，一直冲过鞋山。不料，这正中

了太平军的计谋，封锁线在深冬水涸的有利条件下，很快重新加固起来，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一部分关入鄱湖，一部分留在长江，留在长江的又都是一些快蟹、长龙大船，不堪战斗。于是，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乘月黑迷漫，驾小船用火猛攻长江中的水师，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号，夺得了曾国藩的座船，捉住了管驾官刘盛槐、李子成，监印官潘兆奎、葛荣册，缴获了船上的符册，曾国藩骇极，投水寻死，被附近小船捞起，仓惶逃入罗泽南营。

湘军水师的这次惨败，曾国藩写的一篇文章《石钟山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中，倒有一段老实的供词。他说：“于是水师有外江内湖之分……驟然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不得合并……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湖口之战，不仅把为满清王朝效劳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灭，而且扭转了太平军在长江下游的不利局势，使太平军乘胜第三次攻克了武昌。因此，石钟山成为革命遗址。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了中华民国成立。可是这次革命，后来却被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以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打击革命力量，实行独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军事独裁统治，收回已经失去的辛亥革命成果，以江西讨袁军在湖口起义为起点，组织了一次武装斗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二次革命”。或称“癸丑之

役”。这次革命斗争地区，曾波及南方七省，是我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袁世凯下令撤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江西都督之职，命黎元洪以副总统兼领江西都督事。为了镇压九江、湖口两地革命党人，黎元洪命令驻武穴的李纯军入侵江西。李纯奉命于七月五日、六日陆续开赴九江。

李纯进兵九江的消息传出后，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旅沪的国民党人开会商议讨袁，公推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首先从江西发难。

七月八日晚，李烈钧回到湖口，即着手编配部队，拟订作战计划。并召集在湖口的江西各军官及随行高级官员开会。会议决定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以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兼正面军司令，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左翼军司令，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为右翼军司令，原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参谋长。七月十日讨袁军高竖白旗，宣布湖口独立。并由参议员杨赓笙（湖口县城双钟镇人）撰拟《讨袁檄文》。十一日清晨，战斗首先在沙河展开，讨袁军林虎部击败李纯军首战告捷。同日，李烈钧也占领了石钟山下东炮台和对岸梅家洲西炮台。

湖口起义消息传到南昌，受到江西护军使欧阳武和军务厅长俞应麟等的支持。他们立即召集全省各机关首长，省议会全体议员及各党派团体负责人，举行讨袁大会，会议推举欧阳武为江西都督，原民政长俞国昌为省长，宣布江西独立，并布告全省人民，誓师讨袁。

七月二十二日，袁世凯下达“讨伐令”，以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率李纯、马继增等部加紧进攻江西，并令海军次长汤芗铭

协助。汤率领兵舰六艘，诡称孙中山派来助战，骗过马当要塞。汤到湖口，连日炮击湖口炮台，李烈钧因无力抵抗，遂放弃湖口，退守吴城。以后，又回到南昌。这时，欧阳武、贺国昌、俞应麟均已离开南昌，李烈钧便命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誓师固守南昌，并派遣军队开赴乐化一带防御。在李纯的攻击下，伍毓瑞以四营之兵，挡李纯一师之众。经过激战，终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退守牛行防线，并请李烈钧撤离南昌。以后李烈钧东渡日本，伍毓瑞退守进贤后，将部队解散，也亡命日本。至此，湖口起义，遂告最后失败。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远在一九一九年，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富有悠久革命斗争传统的湖口人民，积极响应。县城首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开展街头示威游行，查禁日货。很快扩大到工人、农民、商人及各阶层，成为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同时，县城成立了商学联合会，继续组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将查出的海带、香烟等日货，在圣庙前集中焚毁。

“五四”运动，进一步唤醒了全县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卖国的封建军阀的憎恨，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民主爱国主义教育。

一九二五年，全县遭到严重旱灾。赤地一片，颗粒无收。在饥饿的威胁下，全县各地广大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打开地主豪绅的“积谷仓”。将积谷散放给灾民。这一暴动，打击了地主豪绅，震动了县衙的反动统治者。

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九江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湖口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县城考棚旁边破厅堂里召开。

会上，成立了湖口县特别支部。从此湖口县的革命斗争，就直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口王燧村（现在的舜德公社）举行。当时任弋阳县委书记的方志敏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委员。

一九三〇年四月，湖口县党组织，为劫狱营救特委书记黄光，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和革命群众三百余人，趁半夜分三路向湖口县城进发，突破了敌海陆军重兵驻守的防线，打开了监狱，救出了黄光同志，释放了三十多名政治犯，烧毁了伪县政府钱粮串，缴获了敌人子弹五箱。

一九三〇年八月，赣东北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后，由于战略转移、撤离湖口，不到四十天，彭泽、都昌、湖口三县反动武装一千余人，共同联合，组织三县围剿，以扑灭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因此革命组织，遭到很大破坏，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放弃长江军事要塞马当，日寇首先出动飞机，对湖口县城，进行狂轰滥炸，然后溯江西上，于七月二日，占领了湖口县城，并迅速占领了全县。伪县政府逃往武山石埠洞。日寇占领湖口后，立即搜罗汉奸，组织伪政权机构县维持会及各沦陷区维持会。日寇凭着汉奸为所欲为，汉奸依着日寇作威作祸。他们沟通一气，狼狈为奸。对全县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烧杀，奸淫。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日寇在流泗、棠山、长垅一带，烧房千余间，杀死无辜群众一千三百余人。周细村共有二十四户，竟被烧光杀绝。被活埋的青年达五

十二人。在县城，日寇经常把抓来的革命志士、爱国人民，装入麻袋，从石钟山矶头，投入江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郭老诗中所说的“日寇沉人岬”即指此。

在日寇占领期间，全县人民进行了许多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深入敌营，进行爆破，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打死强奸妇女的日寇，并埋尸灭迹。还有的骂敌而死，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一九四四年，流泗、张青群众，在我新四军配合和支持下，化装民伕，巧计袭击驻守在望夫山的敌人，八个日寇，除一人逃跑外，全部被民伕们当场用锄头挖死。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战争灾难的全县人民，开始重新恢复被日寇严重破坏的家园。九月，曾活跃在彭泽、湖口边境坚持抗日的我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躲藏在武山石埠涧的伪县政府和一些官老爷们，又重新回到县城，夺取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五年，组织反共的绥靖工作团。一九四七年，成立了县政工队。解放前夕，组织了国防部赣东北青年救国团第三支队等反动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并调遣国民党匪军356团驻防湖口，继续与人民为敌。

湖口全县倚湖（鄱阳湖）靠江（长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称鱼米之乡。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县人民不仅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着水、旱、病（血吸虫）三灾的摧残。许多农户，流离失所，不少村庄，人烟绝迹，石钟山被伪海军和国民党县党部先后占据，到处设立禁牌，不准劳动人民上山。许多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弄得残垣断

壁，破烂不堪。当时的石钟山，真是蛇虫出没，一片荒凉，石钟有怒声，山岚无秀色。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五月九日，解放军在革命老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湖口县城，解放了全县。迅速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地方政权。湖口人民，重见天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倒了“三害”，发扬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精神，消灭了“三灾”，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石钟山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下，拨款进行了多次维修，面貌焕然一新。

登山眺望，山的东南面，是县城双钟镇。这个小集镇，解放前百业凋零，一片萧条景象。全镇只有两部补锅小铁炉和几个白铁敲打工。当时人们看到的是江面上横冲直撞的洋人船只，听到的是天空中外国飞机的马达声。解放后，人们在太平军抵抗清军的炮台遗址上，在日寇飞机轰炸过的瓦砾废墟上，建起了机械、造船、发电、农机、电机、电器、工具、制药、五金等工厂和食品、水产加工厂等二十余个，街道上新修的柏油马路，宽敞整洁，市场一片繁荣。

山的两面，是鄱阳湖和长江的汇合处，水分清浊两色，现出一道天然界线。即郭老诗中所指的“水文黄赤界”。在那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千万条渔船，穿梭奔忙，渔歌嘹亮。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就是指的这里。湖口八景中的“沙舟渔唱”也是说的这个地方。解放后，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机械化，每年捕捞几十万担鲜鱼，除满足本地区食用，还远销国外。湖口的“鱼餐”，深受前来旅游的国际友

人的欢迎。渔民们过去世代以船为家，终年水上飘流，现在定居陆上。鄱湖两岸，建立了许多渔民新村。渔民们在以水上捕捞为主的同时，还在岸边，筑坝开塘，实行捕养结合。

山的北面，是新开采的矽砂矿。这里蕴藏着丰富优质的矽砂。一艘艘巨轮，满载着金黄的矽砂，源源地运往全国各地，支援四化建设。

最近，石钟山划归庐山旅游区范围，定为对外开放点，中外友人，络绎不绝，来山参观游览。近两年来，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随着祖国四化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石钟山将会建设得更加繁荣，成为中外旅游者游览和休憩的风景胜地。

北伐军光复南昌前后记略

李世璋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时期。当时，我正当青年，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巨浪推动下，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弹指之间，不觉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前，我国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我国人民具有革命的光荣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已经展现了宏伟的蓝图。此刻，回顾五十多年前的北伐战争，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现我年逾八旬，而满怀豪情，紧跟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同心同德，奔向四化，尽我所能，多作贡献。兹就个人记忆所及，将北伐战争中的几个片断，略记于后。如有疏漏之处，希同志们补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国内危机，党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帮助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宣告国共第一次合作，旧的三民主义已经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诚心协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自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先后通过两次东征，一次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

就在这一年，我由北京来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在此时期中，我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更主要的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周恩来同志，林伯渠同志，李富春等同志的教导，使我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一九二六年，全国工农运动高涨，中共中央召开了特别会议，主张北伐。这一年的七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了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

当时北伐军共有八个军，中共优秀的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等同志，都担任了北伐军的党代表。我离开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的革命大军。当时我担任第六军政治部秘书。军长是程潜。党代表是林伯渠。由于林伯渠同志当时在武汉中央任常委工作，由我代行第六军政治部负责的职权。但我经常地保持与林伯渠同志的密切联系。

北伐开始时，第六军的任务原来是支援攻打武汉，彻底消灭吴佩孚的预备队。由于北伐军进展十分迅速，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旗开得胜，叱咤风云，以风卷残云之概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不久，就攻下了武汉，我们第六军改变作战计划，接受了攻打南昌的任务。

第六军共辖两个师，师长有杨源烬、张振武等人。我们从广东出发，经湖南，进军江西。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集结后，先攻修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马坳决战时，全军官兵英勇奋战，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我军也付出了代价，伤亡不小。经过激战，消灭了当面的敌军，俘获了几名敌军中团以上的指挥官。此后，我军乘胜直下南昌，这时，正当秋高气爽，北伐大军斗志昂扬，沿途工农群众夹道欢迎，敌军望风披靡，不堪一击。

第六军军部决定，奇袭南昌。命令挺进部队绕道敌后。我侦察部队与群众紧密相联，对敌军之虚实均能及时了解。当时南昌守敌惊恐万状，极为虚弱。北伐军勇若猛虎，士气旺盛。我军在占领牛行车站之后，立即包围南昌城，在惠民门进行爆破，先头部队冒着熊熊的烈火，越过城濠，穿城而进。在雄壮的军号声中，光复了南昌。

我军军部在凯歌齐奏下，进入南昌城。我随同程潜，跃马而进，南昌市民同声欢庆，热烈地欢迎“南兵”进城（江西人民叫军阀部队为“北兵”，叫北伐军为“南兵”）。男女老幼，聚集街头，高呼口号，情景动人。

我们进驻南昌后，军部设在当时的“督军衙门”。（即现在长征路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我们政治部立即发出了安民告示，宣布北伐军的纪律。接着，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在皇殿侧广场，到会的各界群众一万余人，旗帜飘扬，锣鼓喧天。我代表军部在大会上讲话，宣扬北伐军的政策，并感谢江西人民对我军的支援。群众代表也登台发言，对军阀官僚的罪行进行控诉，对北伐大军表示欢迎与拥护。

北伐军光复南昌时，正是中秋节的前两天。南昌市广大群众，在中秋节的那天，纷纷抬着中秋月饼，前来慰劳北伐部队，群众说：“我们老百姓同你们一起过个团圆节，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在那年的中秋之夜，我曾亲自在市内巡视，家家户户都在欢乐地赏月。我们军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还挂起煤汽灯在街头演出节目，军民联欢。

由于我们第六军当时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薄弱，攻克南昌后，守卫南昌的只有张轸的一个团。这时，逃窜在赣南的军阀邓

如琢部，和盘踞在九江的军阀孙传芳部纠集人马向南昌反扑，我军因力量不足，众寡悬殊，以致失利。于是程潜下令突出重围。我们政治部的所有干部，随军作战，保卫军部作战略转移。江西的工农群众，主动地为我们送情报，并巧妙地为我军作掩护。我们且战且走，退到西山万寿宫临时集结，向赣湘边界转移。程潜此时调驻扎在浏阳、平江一带的补充团作兵员补充。两个师分别在江西高安，奉新等地整训，经军部妥善部署，重新编集三个师，准备再次攻打南昌。

秋去冬来，我军作了紧急的全面安排，军部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第六军共辖三个师：李明灏为十七师师长，张轸为十八师师长，胡文斗为十九师师长。我奉命以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兼任十八师党代表。这时，我们加紧练兵，认真地做好政治工作，士气十分振奋，军民之间极为融洽，团结一致，坚决打垮北洋军阀。

总部为了第二次攻克南昌，部署了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二军鲁涤平部，以及第七军李宗仁部，协同作战，相机配合。中共党员李富春是第二军党代表。中共党员朱克靖是第三军党代表。我们集中了强大力量，再次进军南昌。

一九二六年的初冬，正是十月小阳春的季节，北伐军健儿人强马壮，长驱直入，沿锦江涉章水，强渡赣江，越过濠沟，各路人马，夺城而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之下，首先攻破德胜门，把军阀邓如琢部打得溃不成军，工农群众为我们看押俘虏。南浔线的孙传芳部，望风而逃。活捉军阀旅长唐福山、张风岐等，俘获敌军官兵一万余人。枪枝弹药、军马给养缴获甚多。

我军再次攻克南昌之后，全城一片欢腾，燃放鞭炮，热烈庆

祝。广大群众对军阀恨之入骨。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之下，军部把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唐福山等押在“辕门上”示众（辕门上即现在的长征路口井冈山照相馆门侧）。自早至晚，群众川流不息地前来痛斥唐福山等的滔天罪行。有一位老婆婆，拄着拐杖，指着唐福山的鼻子，一面控诉一面痛哭，因为唐福山这个万恶不赦的军阀，害得老婆婆家破人亡。群众义愤填膺，把唐福山的两撇八字胡须都拔个精光，以消灭心头之恨。后来，经军部批准，将唐福山等三名军阀处以极刑，大快人心。

我们北伐军再次攻克南昌后，第三军留守南昌，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光复后的第一任江西省主席。我们第六军奉命移驻九江，准备攻打南京。我军离开南昌之时，当地群众纷纷前来欢送，高呼：“拥护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这时，已经是桃红柳绿的大好春光。北伐军不顾疲劳，继续前进。当时的部署是第六军和第二军为江右军，程潜任总指挥；以第七军为江左军，李宗仁为总指挥。我们六军自九江出发，沿皖南安庆，芜湖一线，向南京进军。政治部的宣传队，沿途开展群众工作，我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群众积极支援我军，主动为我军运军粮，抬伤员，送子弹，出现了许多军民一家，团结战斗的动人情景。

当时，我军战斗力旺盛，装备也还可以，除了“七九”步枪以外，还有些俄国式的枪枝，以及水机关枪等。军长和党代表发布了命令：全军各师、团、营、连、部队长与党代表结成一体，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作战期中，各级的部队长如果负伤或阵亡，党代表即代理部队长。在行军途中，我密切地同军长在一

起，亲临前线。在军指挥所里的工作是极为紧张而严肃的，在那硝烟弥漫，弹飞如雨的时刻，我们机智沉着，我整天整夜的用电话与各级指挥所联系。与此同时，我还必须到十八师的师指挥所去，因为我兼了该师党代表。

那时南京的守敌是军阀部队“狗肉将军”张宗昌，他的部队中还有一支白俄部队，敌军凭借南京石头城的地形，负隅顽抗。我军以高昂的斗志，气贯长虹，浴血奋战，各路大军直逼金陵，控制紫金山，直捣孝陵卫敌军总巢，张宗昌丢掉三个小老婆狼狈逃跑。我军在雨花台与敌军决战，并分兵向玄武门，朱雀门攻城。我军将士用命，慷慨激昂，迫使敌军落荒而逃。

一九二七年三月，春风拂面，万木争荣，长江浪涛，滚滚东流，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光复了南京。石头古城锣鼓喧天，紫金山下万众欢呼。

可是，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窃踞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却投降了帝国主义，蓄意叛变革命。我军占领南京之后，蒋介石乘军舰来到南京，停舶在下关江面。他电话通知程潜和我，到军舰上去谈话。当时，蒋介石已事先派遣了特务杨虎和陈群，进入南京搞阴谋活动，利用一些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左派市党部以及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反动气焰颇为嚣张。在这严重的时刻，林伯渠同志曾劝说程潜，设法把蒋介石从军舰上诱到军部来开会，可是程潜并没有这样做。

就在蒋介石到上海去后，南京江面的帝国主义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幌子，向我下关一带进行炮击，妄图威胁北伐军。这时，林伯渠同志以党代表的身份，对程潜说：“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必须

须以炮还击。”当即由军部命令炮兵，向长江敌舰开炮。帝国主义者看见我军的英勇无畏，无可奈何地由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解，我军重申保护所有在南京的合法华侨的政策。双方炮兵停火。为了这件事，蒋介石在七月份曾下令通缉炮兵还击的指挥人、卑鄙无耻地声称林伯渠、李世璋是“祸首”，“要缉拿惩办”。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丑恶嘴脸。

蒋介石的阴谋是勾结帝国主义，以及在南京建都，成立反动政权，进行法西斯统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革命的工农进行大屠杀。而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同年四月十五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就在这两股阴云之下，蒋介石把何应钦的第一军调进了南京，对第六军进行突然袭击。

第六军余部，被迫退往武汉，而蒋介石与汪精卫相互勾结。其时，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先后被第六军平复。到一九二七年的七月份，武汉汪精卫公开叛变，实现“宁汉合流”，从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遭到失败。

大革命之失败，造成中国的大倒退，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劳动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北伐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因素是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当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以后，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江浙财阀集团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拉拢帝国主义，俯首听命，勾结财阀，倒行逆施。而在这革命严重的关头，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使革命事业遭受危害而导致失败。

北伐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坚持斗争，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以磅礴之势，领导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就独立领导工农进行武装斗争。同年八月七日，党中央武汉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代表中央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此后，又沿罗霄山脉南下，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起各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龚屏整理)

1980、8

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谭志刚

出 征 之 前

中国工农红军七军团，是在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时刻，由闽、浙、赣红十军一部分扩编而成的。朱德同志在福建建宁主持了成立大会。就在这时，上级调粟裕同志和我到七军团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发展得非常顺利。红一方面军已经拥有十万人的队伍。党员人数显著增加，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可惜不久，“左”倾机会主义把持了中央，完全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以一百万军队，其中五十万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穷凶极恶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红军根据“左”倾分子的命令，采取了冒险进攻，拒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打法。虽然红军英勇战斗，却仍然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相反根据地越打越小，人越打越少。

我红七军团浴血奋战，曾连克永安等城。但是，由于“左”倾军事路线贯穿一线，我们被迫同远远优势于我的敌人拼消耗，

致使部队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损失，只好撤回瑞金。此时整个中央苏区的情况极为糟糕，全军几乎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面对严酷的现实，迫使红军不得不考虑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党决定在主力长征之前，先派出一部分红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杀出重围，打乱敌人围攻部署，调动和牵制敌军一部，为主力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重任。它毫无疑问地将付出重大的牺牲代价和承受艰难困苦的考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红七军团（后为红十军团）的肩上。

离别瑞金

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七军团为主组成。但是下属二十一师，中央决定待红军主力长征后，原地坚持游击战争。这样，先遣队只留有三个师的编号，实际兵力仅有三千多人，而且装备差，战士手中仍有不少红樱枪、大片刀。军团首长有：寻淮洲、粟裕、周群、刘英等同志，我当时任军团卫生部长。

我们卫生部下设有医务处、药材科、管理科、担架队共一百多人。机构虽说健全，实际上真正懂医的很少，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做一些切脓包、缝合伤口等小手术。医疗器械和药品更是十分缺乏。

出发之前，大家忙着抓紧做准备工作，赶制了一些草药。敷料类很少，就把被子剪开消毒代用。总部卫生部首长专门来看望大家，动员我们要勇于斗争，救死扶伤，不怕流血牺牲……。

七月的瑞金骄阳似火。出征的日子来到了。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肩负着革命的重任，告别了英雄的故土，挥师北上，它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

先遣队诸首长会同护送我们九军团罗炳辉部，走在最前列。紧跟着的是十九师、二十师，最后是卫生部。刹时枪矛林立，战马嘶鸣，部队迈着雄健整齐的步伐，如同一股洪流，滚滚向前。

许多的老乡们赶来为我们送别。军队和老百姓在数年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血肉鱼水情，今天更是充分地体现出来——他们提着茶壶，拿着茶碗请我们喝茶。虽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将去何方，但是知道我们就要离开瑞金了。都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握手告别。

这激动的场面，一幕幕感染着我，使我对火热的瑞金生活激起了强烈的情感，那些大瓦的祠堂，是我学习和工作过的瑞金红军学校。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学习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那个操场，中央首长经常来看望我们出操、锻炼。林伯渠、蔡畅等老同志还亲自给我们讲课。这些仿佛就在眼前。可是我们就要离开它远去了，此一去还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怎不叫人难分难舍呵……。

我默默地随着大队走出了瑞金，禁不住一再回头眺望那渐渐消失的村影，一股激流在心中激荡，变成了最后的心声：“再见了，瑞金。”

进入福建

果然不出所料，迎接我们的是接踵而来的残酷现实。部队刚

刚进入福建，蒋介石就调动了大批人马日夜兼程对我实行围、追、堵、截，与其说部队天天在行军倒不如说天天在打仗。我军不仅要堵击追赶之敌，还要同沿途十九路军和反动民团作战。人地生疏，损失很大。最叫人气恼的要算那些大刀会的亡命之徒。这些家伙，用朱砂涂成大花脸，红花绿袍，身上贴着鬼符，张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吓人。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悉，一会儿漫山遍地都是，敲锣打鼓偷袭我们，一会儿几乎全不见了，气得战士们直跺脚，对着大山喊：“你们有种出来打，别偷偷摸摸的来”。军团保卫局长周群同志，就在这时被大刀会的暗枪打碎了膝盖骨。当时由于情况紧迫，不容停下来治疗，因为随时都可能被围，卫生部决定，所有伤员全部用担架抬着走，一个不要丢下。为了避免意外，我们离开了大路，走上了崎岖山路。为了不暴露目标，只得白天宿营，傍晚开始行军。

闽南山区，山高陡峭，茅草丛生。有的茅草长的比人都高，蚊子、虫子咬得人实在难熬。几十里出去都不见炊烟。部队在黑夜中摸索着前进，一路上摔伤、碰伤的不知其数。但是听不到一声怨气，整个部队的情绪仍然是十分的饱满。

我们接连在深山里转了几天之后，便开始了行动。首先决定围打的是永安县城（几个月前我们曾打下该城、打垮了土军阀陆得邦）。

永安是闽南山区的门户，三面环山，一面临燕江，是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发达区。因此打它就等于在老虎屁股上抓了一把，蒋介石势必派兵增援，我们就可以直接调动围攻苏区的敌军，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为我们北上抗日造声势。果然，我们刚刚把永安围住，大批的敌人就火速向我们迫进。于是围堵我军的敌人

增加到三个整师又加十八个团，共计几万人马，加上阻截的敌人，超过我们几倍。在这种情形下，军团首长决定，虚晃一枪，放弃永安，掉头东走，渡过闽江甩开敌人，尔后再寻战机。

部队冒着大雨，连续几昼夜的强行军，于一日晚间到达了闽江中游一个叫樟湖坂的小村外。

樟湖坂是闽江中游的一个小渡口，水面较宽，中间有一小岛，阻挡了激湍的江水，是个理想的渡口。军团首长决定由此过江。根据侦察，村子里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我先头部队摸了进去，一顿猛打，只十分钟便解决了敌人。部队立即分头找船做渡江准备，谁知找遍了整个村子，只有一只小舢舨，情况非常紧急严重。如果单靠这只小船，到天亮也无法过完，如果天亮前过不完，队伍暴露，不仅前功尽弃，甩不开敌人，还可能陷于背水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担任护送任务的兄弟部队九军团，决定就此回瑞金去。为了保证渡江时间，使全军得以轻装北上，卫生部考虑再三，决定把担架队和重伤号一起交给他们护送回苏区。军团首长周群仍随我们继续北上。

黑夜中，我们送别了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战友，靠着一只小舢舨，渡过了白浪翻滚的闽江，胜利地到达了彼岸。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部队几乎没吃一顿热饭，睡过一次安稳觉，大家都很疲乏，急需休整和补充给养药品。可是我们早已深入到白区，靠苏区支援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解决。

距离樟湖坂北岸约百余华里，有一个大镇叫水口，镇上好几千人口，又是产粮区，估计解决补给是不成问题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镇上只有部分保安团，敌人的正规军尚未到达。先遣队请示了总部之后（我们出发后，一直同瑞金保持着联

系），决定乘虚而入，马不停蹄，立刻奔袭水口镇。我们沿闽江而下，整个部队用高速度前进，次日凌晨到达水口，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进攻。等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我军早已兵临城下，很快就突破了敌人防线，仅半小时就彻底打垮了敌人，水口镇即宣告占领。

我心里惦念着药品，急忙带着部里几个干部四处寻找。我想偌大的镇子，总不会连行医的都没有吧？果然在街口找到了一家，这是一幢十分讲究、漂亮的楼房，有一个医生，带着两个护士。见到我们进来，先是吓得要命，三个人缩成一团。我即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要他们不要害怕。又说明我们目前缺乏药品的困难，希望能出于人道主义给予支援。那个医生听我说得很诚恳，又见我们的确没有坏意，顾虑慢慢消除了。经过一番交涉，他同意给我们药品。这一下我们发了大财，红药水、消炎膏、纱布、绷带弄了一大包。根据党的政策，我们给他留下了足够的银洋，提着大包药品胜利而归。

在闽北山区的路上

部队打下水口镇，得到了补充后，我们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是继续南下。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围攻了福州。由于敌人防守严密而又有重兵把守，打了三昼夜，未能攻克。接上又攻宁德，也未攻下，便直插闽北，开始了北上。

在闽北连绵起伏的山岭里，在崎岖曲折的羊肠小道上行军，中途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情……

军团保卫局长周群同志的腿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在当

时紧迫的情况下，只是做了一般性的护理，而且日晒雨淋，伤口严重感染，腿肿得象冬瓜，高烧使两腮通红，干瘦的脸上眼睛都凹进去了。我经常跟着他的担架一块行军，他为了不愿在我面前暴露痛苦，总是强忍着剧痛，保持着平静。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的故事和革命道理。他很健谈，知识广博，虽说只有二十来岁，长的像个书生（他原是武汉的一个工人），实际上可以说他已是饱经风霜的人了。我们在苏区就熟悉，他对我很关心，记得临长征前，他还特地给我选换了两个年轻的警卫员。

部队刚进闽北，他的伤口就急剧恶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经检查，发现整个大腿都已经坏了，如不及时抢救，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唯一的办法只有截肢。就我们当时的技术而言，要实施这样大的手术，困难重重，首先就没有人会做。寻司令员立即向总部报告了情况，总部给我们的复电是：“一定要救活他”。寻司令员、粟参谋长来到部里传达了总部指示。根据这种情况。我只好当机立断，决定着手准备手术，我自己上台。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思想上是很复杂的。主观上多么希望战友能转危为安，实际上这样的手术，我连看都没有看过，只得连忙翻书，临时查找教材。缺少器材，我就跑到老乡那里借了把木锯，没有手术室，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搭起手术台。手术就这样紧张地开始了，军团首长守护在外面。我照着书，仔细地切开皮肤，分开肌肉，暴露出骨膜……手术整整做了两个小时，我全身汗流浃背，最后手术成功了，周群同志得救了。大家为成功而高兴。军团首长向我们祝贺，并鼓励我们再接再励，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技术。

这是我七军团，在艰苦的条件下，做成功的第一例大手术，至今我也难以忘怀。

见到了方志敏

我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福建四个多月，打败了敌人的围阻，牵制了部分敌军，在闽北攻克浦城后，十月间进入江西东北部。中央决定我们和那里的红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

赣东北根据地作为当时的模范根据地，在瑞金就听说过。到这里一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红区到白区几十里之间没有入烟，满山的大树都砍倒，横七竖八，漫山遍野。根据地军民，依靠这样的障阻，一次又一次地抗击敌人的围攻。当我们接近根据地时，那边已派人前来带路，我们到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走到弋阳，我们胜利地与当地红军会师了。

中央决定由赣东北根据地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同志任我军政治委员会主席。刘畴西同志任总指挥（他是我在红军学校的的老首长）。记得在弋阳的一个镇子里，根据地负责人会见了我们先遣队的干部。一进门首先就看到了刘畴西总指挥。我高兴地跑上前去，刘总指挥用仅有的一只胳膊热烈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欢迎我们。寻淮洲同志把七军团的干部作了介绍。这时只见一个身穿旧长袍，约三十岁的人向我们走来。刘总指挥忙介绍说：“他就是方主席”。呵，他就是方志敏！大家哄地一下子围住了他。因为方志敏这个名子，我们早就听说过，今天见到格外高兴。方志敏同志一一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他长长的个子，宽宽的额头，两眼炯炯有神。他操着江西地方口音和我们交谈，详细询问了我们一路上的经过，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在一起不觉地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方志敏同志，他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血战在怀玉山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敌人对赣东北根据地的进攻更加疯狂了。同年十一月方志敏决定我军撤出根据地，继续北上。

我红十军团从江西经安徽等地，势如破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震动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敌人又慌忙调集大批兵力前来阻拦。非常不巧，我们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一带与敌人遭遇了，敌人投入了远远超过我军七倍以上兵力，并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我发起攻击。我军被迫应战，敌众我寡，战斗空前激烈残酷，双方短兵相接，来回争夺阵地，阵亡无法统计。寻淮洲同志在冲杀中腹部受重伤，等我们抢救下来，没多久就牺牲在担架上了。经过十多个小时血战，部队剩下不足三千人，而且越打情况越不利，为了保存力量，方志敏决定暂时撤回根据地去。

我们刚撤出战斗，敌人立即封锁了各路口要道，部队只好进入荒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希望从这里闯出一条通往根据地的道路。

此时，正值严冬，满山一片银白，呼啸的山风，卷起无数冰渣，铺天盖地打来。我们在尖锐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冰凌把脚划成了一道道血口，我们穿着草鞋，赤着脚在雪地上走着、爬着。有的人实在支持不住了“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有的坐下来休息还是活生生的，而部队再行军时，却一动不动的留在那里了。饥饿、寒冷夺去了我们许多战士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军团首长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刘总指挥顽强地用一只胳膊闯路，方主席患重病，拒绝同志们的帮助，坚持走在队伍中。我们这支破衣烂衫、面黄饥瘦的部队——一支顽强的部队，从最高首长到普通战士都在与饥饿、寒冷、死亡搏斗着前进。

我们在漫无边际的林海中辗转了三天，终于进入了江西境内的怀玉山区。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二千多人的行军竟拉了十几里长，速度非常缓慢。掉队的就更多了。卫生部走在后面，担当收容任务。

这天晚上我们悄悄地接近了封锁线，敌人隔着一条河在对岸山上。借着淡淡的月光，可以看到一个挨一个的碉堡，敌人不断地朝这边打冷枪。我先头部队由粟裕、刘英带领，找到了一个缺口冲了出去，但可惜大队没有接上，方志敏同志怕大家找不到目标，便在河边烧了一堆火，要部队向火堆集中。

见到火光，我急忙朝那走去。在火光下，看见方志敏、刘畴西和曹仰山（一个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坐在一起。见我来了，方志敏问道：“后面还有多少部队，离这里还有多远？”我说：“后面还有一千多人，拉了好几里。”方志敏看了一下天色，脸上露出一丝焦虑的表情，又对我说：“你赶快过河，到前面找参谋长，情况紧急，这个缺口随时都可能封死。”我担心地问他：“那你们呢？”“我们在这等后续部队、电台。”方志敏同志冷静地回答。首长们在这种情况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心里只有部队，我非常激动。我对他讲：“我不先走，我等着和首长一块走。”

云雾环绕山峰向四方散去，天边露出了朝霞，我们还没有来

得及通过封锁线，敌人就堵上了缺口。敌人以八倍于我的兵力把部队包围在方圆不出十几里的山上，我们失去了唯一的机会，方志敏同志只得带领我们上山，准备反击敌人。

天刚亮，敌人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仗着人多，象蝗虫似的过了河，嚎叫着向我发动疯狂的进攻。军团部、卫生部上至总指挥，下至卫生员全都投入了战斗。我们借着茅草、大石头躲藏起来，等敌人上来突然一个反冲锋，冲进敌群，用刺刀和枪托与敌人搏斗。战斗中，方志敏沉着地指挥着部队，他组织了敢死团等，打垮了敌人多次的进攻。战士表现出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尽管几天都没有吃到东西，身体非常虚弱，仍旧用石头，用牙齿与敌人混战肉搏。但是寡不敌众，部队最后还是被打散了。

我带着几个同志，在树林中摸索着，幸好天黑下来，敌人撤了下去，我们才慢慢地摸出了森林，寻找战友。突见山头有一团火焰，它如同黑夜里的明灯，四周躲藏的战友都向火光靠拢。我们连忙爬过去，是方志敏同志，他见大家都集中了便站起来大声地说道：“我们不要被敌人所吓倒，革命不会垮的，大家要沉住气，要想办法冲出去。……”说完，他把我们剩下的几十个人又组织了一下。但是第二天，我们这几十个人又被冲散了，我只好带着几个卫生员和几名干部进入深山。

不幸的是，进山第七天，由于饥饿难熬，大伙在找东西吃时，全部被捕了。

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区坚持了整整七天，除粟裕、刘英等所带一部冲出重围外，大部份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一部份不幸被捕，其中包括：方志敏、刘畴西、周群等同志。

在 狱 中

南昌敌人所谓的“模范”监狱看守所里，关押着大部北上抗日先遣队被捕的连以上干部。除军团首长外，全都分别关在几个大牢里。我们这个牢共有三十多人，基本上都是原赣东北的干部，我认识的只有胡天桃（师长），张志斌（师政委）和乔信民同志（一个团长）。他们比我先来几天。我刚被押进来，张志斌就告诉我：“方主席和刘总指挥也被捕了。”他用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间房子：“就关在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真使我心痛！我是多么想见见他们呵！我趴在窗口望着那牢房，等待着机会……。没过多久，见对面牢房的窗口上有人晃了一下，接着便出现了方志敏同志和蔼的面容，我差点叫出声来。志敏同志发现了我，他和往常一样地微笑着朝我点头。接着我又见到了刘畴西同志。从首长镇静而又亲切的眼神中，我得到了安定和温暖。

第二天，一个看守塞给我一本书，二话没说就走开了。我莫名其妙地接过来，是一本很破旧的古装本，我不解其意地翻弄着，突然发现一张纸条夹在里面，忙展开一看，纸条上清楚的字迹展现在眼前：

“时清：

判决可能很快就会下来，我们几个军团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活着的。但是，估计你可能不会死。你要准备坐牢，如有机会出狱，赶快和党联系，千万不要忘记苏维埃。

“方志敏”

我久久地凝望着这短短的几行字，心里如潮水般的激荡。和志敏同志虽说只相处二个多月，他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这不是普通的信，这是一个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产党员对我们有希望活着的人的嘱托呵！情况正如志敏同志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凶恶地杀害了军团首长和大部分师干部。我们一次次含着眼泪送别了他们——刘畴西、王玉池、曹仰山、周群、胡天桃、张志斌等同志。

一九三五年八月，党的忠诚战士，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了。噩耗传来，监狱一片悲痛。志敏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一生，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因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又是医官，所以免于一死，同乔信明一齐下了大牢。直至西安事变后，才走出这万恶的魔窟。出狱后，我牢记志敏同志的遗嘱，怀着复仇的心情，找到了党，从此又开始了战斗。

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了革命的需要，苦战四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纵横数千里，牵制了敌人三个整师又十八个团，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从意义上讲掩护了主力红军长征。它所付出的重大牺牲将同它的历史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1980年7月，于庐山。

随“八一”起义军南下略记

陈勉哉

“八一”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曾亲自经历，虽事隔五十多年，记忆犹新。

“八一”起义前，我是江西全省学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原主席、总务主任邹努已被新军阀朱培德以“礼送共产党出境”名义，与省、市党部，群众团体负责人，包括一些左派如刘一峰、王枕心、李松风、李桂生等，一齐被送往武汉。我事前虽不清楚起义计划行动，但在起义后，由于负责工、农、妇、学、群众团体宣传及组织庆祝大会，参与了很多工作。起义军退出南昌后，又随军南下，直到军事失败止，始终参加南下队伍，由于接触面广，情况略有了解。

最近先后看到一些关于“八一”起义史料，有些与当时事实有出入，深感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又因有关方面再三催促，只有就自己记忆所及，简要叙述如下。

山雨欲来风满城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左右，我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后，由武汉回到南昌。感觉到和我离开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我去武汉以前，南昌是阴沉沉的。自从朱培德和汪精卫、陈公博（驻江西特派员）与张发奎拉拢后，又和南京的蒋介石暗中勾结，逐渐露

出了反革命的青面獠牙。先是制止我们公审反革命“AB团”首犯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巫启圣和搞封建迷信的张天师（张恩溥），接上又从监狱里把所有的反革命囚犯放掉，以后，竟以“礼送共产党出境”名义将党、政、群众团体的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其中有建设厅长、省党部组织部长刘一峰，教育厅长肖炳章，省府委员王枕心，省党部青年部长邹努，妇女部长李桂生，商民部长邓鹤鸣，市党部秘书长傅惠忠和宣传部周继晖等三十多人）遣送到武汉去，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整个工作，一时陷于停顿。我可能是由于年纪还小，未被注意，继续留在江西学总和南昌学联工作。当时反革命的气焰一度嚣张，群众受到压抑，南昌城几乎处于窒息状态。

我去武汉是参加第九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江西出席代表三人，除我以外，还有九江学联周召南（同文书院学生）以及被送出境的邹努。到达武汉后，武汉市的情况也很紧张，乌云密布。首先听到的是国共关系又再度恶化，具体表现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与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出走，临走前发表对时局宣言，发表告人民书。从邹努（已在武昌蛇山××大学筹备九代会）、林植夫（八届常委，福建人，后参加福建人民革命）等人谈话中，知道局势很紧张，正在争取张发奎东征，使宁汉不致联合，另一方面也正在考虑应变的准备。大会期间，本来说是由主席汪精卫或是孙科来会做报告的，可是，一再改期，改到最后，汪、孙都不来，只派了一个所谓秘书长胡××来讲些不痛不痒的话。在一个星期的会议期间，我和邹努抽出时间走访了总政治部宣传科、团中央和一些被送出境的江西同志，一般都为革命前途担忧，很多人心情却感到沉重。政治部很

多同志都已作了离开政治部参军拿枪杆子的准备，有的已经去当下级军官，有的竟去当兵了。知道这是组织的决定，只有掌握了枪杆才有力量。随着时间的过去情势更加严重，学代会草率收场，邹努也由组织分配，据说要到开封冯玉祥部队里做政治工作了。我也匆匆忙忙的离开了武汉，由武汉到九江，江上军运频繁，由九江到南昌，车上多是军人，情势相当紧张。

当我回到南昌，街头张贴了欢迎铁军东征的标语，很多学校一一七师、女职等都驻了东征军队。特别是听到不少流亡在武汉的各省革命领导人物已纷纷来到了南昌。江西被遣送到武汉的同志也很多回到了南昌。于是革命的火焰又高涨起来，我以为将要东征了，心情也渐舒坦了一些。

夜半枪声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约莫二点过后，枪声大作，我从梦中惊醒，马上起床来到室外。我当时是住在东湖边上三道桥与状元桥中间的江西学生总会里（原来的“匡庐图书馆”），同住的有学总的专职秘书关××，南昌学联组织部长傅铭第（高安人，后在江西省一所大学里做副教授），财务部长彭学遂（安福人，其兄彭学沛是国民党的大官僚），大专部长曾洪福（大专学生）都起了床，开门看望，只见火星四射，流弹呼啸。枪声来自讲武堂和大校场一带。

情况虽然很突然，大家感到很紧张，但并无惊慌。我们早就听说反动派的三军留驻的不多，大部分开往外地去了。而东征的部队据说来了两个军，有好几万人，外加朱德同志掌握了教育团

和公安局的警察，革命力量是强大的，所以我们都没有走开的打算，但心情毕竟还是沉重的。

大约打了两个多小时，枪声由稀疏直到停止。这时天已亮了。我立即出外，看见湖边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挑菜叫卖的还是照常一样。过总工会，张国、淦克鹤等人都站在门口，告诉我昨晚是东征部队缴反动派部队的武装，并且完全解决。经百花洲，磨子巷到洗马池，大街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到了省党部，会见负责的罗石冰（当时任省党部秘书长），他才把贺龙、叶挺武装起义和军委书记周恩来在这里主持的情况简要地告诉我。并要我马上回学总，汪泽楷书记可能有任务分配。

我兴奋地回到自己的单位。途中经过《江西民国日报》的印刷厂（百花洲），会到一些工作人员，知道报纸正在印刷中。并报道了起义的消息。回到学总，学总已聚集了不少的学生干部。当我把“八一”起义消息告诉大家后，人人笑逐颜开。

为庆祝胜利奔忙

回学总不久，大胡子省委书记汪泽楷亲来学总，交代三件工作：第一、立即以群众团体名义，电请正在庐山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速来南昌；第二、以群众团体名义欢宴各省革命领袖及起义军团长以上军官（附了一张名单）；第三、和总工会一起组织庆祝会，并布置会场。我当即请专职秘书，起草电稿，但这位秘书没有写过这种电稿，仅仅写上“……敬请我公早日来到南昌共商大计”寥寥一百多字，我也不太懂这一套，就自己送了去。汪泽楷对这电稿很不满意，还是由刘九峰（前省委书记）重

写，我才去电报局拍发。然而，我再到国民党省委党部和罗石冰同志商谈工作，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筹备欢宴与庆祝事宜。欢宴由学联负责，庆祝大会由总工会筹办。

八月二日庆祝大会在皇殿侧体育场召开，到会的有数万人，工人、农民、学生，还有部分起义部队。主席台上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革命领袖及起义部队代表。台上的横额写的是：“庆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二十军贺龙军长，他在会上宣告革命委员会成立，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打倒帝国主义”、“庆祝起义的伟大胜利”。等口号。

八月一日《民国日报》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宣言（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吴玉章等署名），并发表了致革命同志书，斥责蒋、汪背叛国民革命和三大政策。八月三日群众团体开了座谈会，报上公布了革命组织名单，同时也刊登了庆祝大会的盛况。

原定八月四日欢宴各省革命领袖及起义军队高级官长，由于即将撤离南昌，停止举行。

撤 离 南 昌

八月三日我们获悉起义军即将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先后开了会，听了报告。我是团省委之一，由于工作的需要，确定我是留下来，转入地下工作，就开始作了应变的准备。学运方面由我和傅铭第负责，并决定先在附近郊区暂时隐伏一下，以后再看情况决定。当时在市区原来有一栋房子（革命街），是当“礼送共

产党员出境”前夕邹努租赁下来的。后来邹努被送走了，由我和刘伶（学联负责人之一）居住，并邀有万福贞、邓婉如两位女同志作为家属同住。此屋因住了多时，外面有些人知道，不宜再用，换租别屋又来不及，只有到郊区去暂避一下。

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根据组织决定将一些曾经出头露面的学生干部派往部队随军南下。经多方面的开会，协商，动员了二十几个学生干部和少数其他部门工作的青年干部，其中有学联负责人刘伶等，但也有个别原先自愿参军后来又退却的曹洪福、彭学遂等。这三十几个同志就在四日下午到学总集合，由省委刘九峰同志率领前往心远分校军委报到，我也随去。记得当时接见的是周恩来同志，他首先对大伙表示欢迎，笑着对刘伶说：“参军，要吃苦，受得住吗？”刘伶回答：“为了革命，生命还不惜，还怕什么苦。”周恩来同志笑着连声说：“好！好！”随即吩咐一个同志带他们去分配工作。周恩来同志还笑着对我说：“想不到我在这里还碰上一个同乡（因我原籍是浙江）。可是今后工作是更艰巨啊！”这几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留下做艰苦的工作，反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做了逃兵。真愧对党！愧对周总理！

撤离南昌，奔赴抚州

从四日起，部队纷纷撤退；参军的同志也打起背包跟部队去了。南昌城顿起变化。五日起，我和傅铭第把学总和学联的公物先移到高安同乡会，准备六日晨请人挑运出城。谁知得到消息，部队完全撤了，听说被缴械的朱培德部下军官有一部分已进了

城。霎时，南昌城突然紧张，店铺关门，街道行人绝迹，而且听到零碎枪声。当即冒险走到女师附近团省委处，刚好他们也正准备通知我。鉴于情况变化，我还是要随军南下。事起仓卒，来不及到傅铭第处取行李，就只身离城。

我知道叶、贺部队是往抚州行进，我就由松柏巷直插到进贤门出城。这时，原来的守城部队也没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的，不时听到有零星枪声。出城后，朝着东南方向奔驰。走不多远，陆续碰上两三起原被缴械逃离的士兵，对我进行盘查，盘查是假，劫掠是真，把我手上的手表抢去，袋子里的钞票抢光。不久，市党部的头头傅惠忠（此人曾到苏联学习，以后投靠了反动派），也带了一伙人从后面赶来，便结伴追随军队南下。但到抚州去如何走法，我们都不知道。正好，一师一个学生叫李琪的，也因为避乱返家（他的家在南昌天灯下），恰是去抚州的大道，他就成了我们的短途向导。他是九点多钟离开的。他说一师的几个“A·B团”头头杨培勋、聂化彬已经控制了学校，由于他平时还未露出身份，所以没有管制他。他觉得还是趁这机会回家玩几天好，反正无书可读。我们走到他家吃了饭，接着按他所画的路途示意图继续前进。到达进贤后，陆续碰上一些落伍的部队，其中有几个人是从李汉魂部队出来的，接谈之下，才知道李汉魂师到达进贤以后，便撕下面皮，把部队往东拉，师里的红色军官，抓的抓，跑的跑，他们几个人就是从部队里逃出来的。我们一同行走，碰上一只装运军官教育团一些学兵的船，指导员胡联璋是过去熟悉的，于是让我们这一伙人挤上船，船小人多，挤得满满的。由于大家志同道合，一路上谈谈“八一”起义前后情况，也谈到李汉魂叛逃情况。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抚州。进城以后，满街

都是南昌来的起义部队，党政干部，不少都是熟悉的人，见着都热烈的互助招呼着，好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从熟悉的人士交谈中，获悉了起义军在这里休整。下午革命委员会要开大会，布置南下任务。在党务委员会会见了姜济寰、邓鹤鸣、彭泽民等人，对我们到来，表示欢迎，并希望我随党务委员会工作。接上，我去临川学联，遇上南昌学联的部长王植三（其兄是南昌市党部商民部干部）也在那里商谈输送一批青年学生参军。我把南昌市的青年学生参军情况以及部队需要补充的兵数和他谈了一下，要他协助临川学联搞好这一工作，直至下午，我去参加革命委员会大会时才离开。

下午的大会是由谭平山主持的。他也是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代宋庆龄主席职务），他谈了南征的政治意义，布置了从第二天起，全军南进，要求严守纪律，团结互助，不许扰民。接上恽代英谈了行军途中，除宣传委员会外，其它各部门都要对群众进行宣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以及我们南下的目的任务，发动群众，支援起义部队。

在会上遇到江西C P 省委刘九峰，他是我的老领导，他现在是随农工委员会南下。他告诉我农工委员会里江西同志很多，而且多是很熟悉的。这样就打消了我去党务委员会或总政治部的打算，跟着刘九峰同志在农工委员会了。记得农工委员会在一所学校的大教室里，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熟人，其中就有不少学生干部（有夏香草等人）。九峰同志带我在一所小房子里去见了主席张国焘，他见到我很冷淡，握了握手，说：“好，就跟我们一道走吧。”看样子官僚架子很大。出房后，又见到一个小个子，讲湖北口音的接待我，问寒问暖，安排我的铺位，挺热情。问了问

旁人，知道他是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陈荫林。他和我们大伙儿住统铺，态度很诚恳，热心帮助人。在行军路上，别看他个子小，身体差，休息时间总是在街头进行宣传。不幸到达瑞金后，却患急性肠炎死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地位，仅次于张国焘。

由于张国焘对我们冷淡，我就产生了转移的念头，听说郭沫若也来了，我想投奔他一定会接纳，政治部里熟人最多，到党务委员会也好。但由于九峰在农工委员会，不好意思转移，而且天色已晚，明天就要出发，时间也来不及了。

由抚州到瑞金

八月九日，黎明前就整队从抚州出发了。

我是随着农工委员会出发的。农工委员会约莫有四十多人，江西人最多，其次是湖北人，也有一些上海和广东人，都是各省市搞农工群众运动的同志。其中有董方城、郭亮、彭湃等主要干部（彭湃没有随农工委员会一起行军，但到驻地时经常会来，因为东江“农民王”的称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江西参加的主要干部有刘九峰，但未有公开职务。

从临川出发，经过南丰，到达广昌后，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二十军，向石城行进，另一路是十一军，向宁都行进。农工委员会也将干部分成两路，我是分配在向宁都方向，这一路负责人是陈荫林。两路都在瑞金会合。每天行军约莫五、六十里，完全是军事化，天不亮就起床，吃早饭就开拔，午晚餐都由前站安排。我们这一批人，都缺乏军事生活的训练，平日疏疏懒懒，开始参

加行军，不免有点紧张、疲累。但是，为了革命，高唱“曙光在前”的少共国际歌和国际歌，边唱、边谈，边走，不久也就习惯了。

一路上，无论官兵，机关干部，都是走路。有少量的马，只是供驮器材食物，个别的照顾同志。就是谭平山、郭沫若等领导人，都是依靠自己两条腿走。年老的彭泽民，肥胖的姜济寰都是扶着木棍走，每天同样要走那么多的路。李立三、恽代英更是雄纠纠，气昂昂的挺胸阔步。前者是搞保卫工作，后者是搞政治工作（江西省府代主席和民政厅长），要做比别人更多的事。见到谁都会攀谈几句，有时开开玩笑。恽代英的眼镜断了脚，他是高度近视，用绳子绑住一边戴上，矮个子，声音宏亮，说话很风趣，大家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农工委员会的主席张国焘，行军时很少和我们接触，一般任务都由秘书董向城布置。农工委员会是发动群众的单位，每到达一个地方，调查、联系、宣传的工作相当多。在江西境内，由于我们是在江西工作的，比较多做一些工作。但在当时，对于农工群众运动，仅仅停留在口头宣传，未曾有实际行动。另外，每到一个地方，还要派几个人负责行政事务工作。如办理支援部队，采购米粮等事务。记得到宁都时，就派了一个原在南昌市工会工作的刘××做了几天临时县长。有时，也组织宣传队写贴语或者到街头宣传。主要是揭露蒋、汪反动派的罪恶，宣传我们要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每次都强调我军纪律严明，要求农工商各安其业。一路上，虽然大兵过境，农民照常耕田，商店照常营业，军民和洽。每到县城，欢迎标语贴满街巷。说明南下起义军获得人心。

八月十八日中午我们快到瑞金时，只看见不少机关部队，在山坡边休息，我们也奉到命令暂停行进，休息待命。消息传来，我军前方部队正在与敌粤军激战。约莫下午三、四点钟时，捷报传来，敌军钱大钧惨败，我军获得辉煌战果。就在这凯歌声中，星夜进入瑞金城。沿途遇见折回来的十一军部队，很多身背双枪，知是缴获了不少武器。大家都高声欢呼铁军万岁。恽代英同志笑嘻嘻说：“现在不止是铁军，应该叫钢军了。”

在瑞金欢度了胜利，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慰劳。部队休整了几天，也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留下了革命火种。

经汀州、下潮汕

离开瑞金折回长汀途中，在离瑞金不远，攀上了江西福建交界的古城隘，从此，就离开了江西省境，踏入了福建土地。

进到长汀后，群众热烈欢迎我们，以前我们找群众，现在是群众主动找我们，而且有青年要求参军。农工委员会这时也更忙起来了。我们因为听不懂长汀话，一般接洽的事是靠少数几个福建同志。

在长汀也休整了几天。一路上病号增多，这时都需要到当地几个医院、诊所去看病。同时缺少医药，缺少日用品，也在这里购买补充。

从长汀继续出发，沿着上杭、大浦两县前进。就在到达潮州前夜，在韩江中流，前面枪声大作，一片火光，火星四射，整个韩江在炮火照耀下，几同白日，浩浩大江，前前后后，尽是起义

军和机关的小船，炮火光在前照耀，但也有枪弹从船后飞来，可能是后面的船只响应放枪。由于江中船多、人多，我们并不害怕。炮火直响了一、两个小时，始行停息。到了潮州后，才知道是前站部队追击逃窜的敌人。

九月二十日左右到达潮州后，我们驻宿在军校潮州分校、地临西湖，这里是陈炯明的老家。湖边建筑得很美观，是他扩建的。

在潮州又开了一次革命委员会全体职员大会。谭平山作了报告，以即将进入汕头作准备，除要做好机关工作外，还要整顿军容，严明纪律，对大家进行宣传鼓动。

在潮州休息了几天后，又分兵两路，小部分留驻闽粤边境，朱德军长率领的部队担负这一任务，大部分贺、叶部队开向汕头。

沿途病号又不断增多，军医很少，药品奇缺，加上行军中途，不能停留，营养不良，有为数不少的同志，病越拖越重，个别的病死途中。当时的病，以疟疾、痢疾、伤寒等为多，传染很快。西医、中医、军医，随军的或当地的，都忙不过来，中委彭泽民同志也就忙碌万分地到基层协助治疗。彭泽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尽管他已年老，穿着一双单鞋到处看病。我在上杭到潮州路上，也患了比较重的病，就是他给我开了几包中药吃好的。他对人和蔼可亲，关心群众疾苦，不论大官、小兵，一视同仁。当时我们对他这样的态度作风，众口称赞。

到达潮州后，彭湃——东江“农民大王”，就和我们在一起。这时，农工委员会开展宣传活动，一直是由他出面。他经常

同我们啦呱，告诉我们，东江是革命根据地，群众革命觉悟高，一到东江，那就是到了根据地，象鱼儿到了大河里一样，不再担心买不到粮食，找不到挑夫。使我们精神为之振奋。广东同志也告诉我，彭湃是大地主、大土豪家庭出身，家里非常富有，但他和农民站在一边，不收地租，而且把土地送给农民，和农民群众在一起闹革命。他在东江一带（陆海丰）声望极高，农民对他敬服与信任，国民党视为“反动魁首”，当地人民则称他为“农民王”。他对人非常谦和诚恳，一口广东东江口腔，个儿不高，戴着一顶褪色的拿破仑帽，面儿更显得黧黑，大家都很尊敬他。

在潮州，大家除了热情振奋地谈到东江以后的设想外，集中地谈潮州刘、杨及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事件，东江、潮汕一带是他们的巢穴，到处都有作恶的事迹，这时，也谈周恩来同志曾经做过东江的专员、削平刘、杨，立下了殊功。只是不知怎的，一路上很少见到他的面，其他革命领袖还可时常见到，可能是跟着前站先走了吧？

我们由潮州到汕头，是坐小火车，这条铁路，刚建不久，据说不久前发动开车还要乘客推动。由于等候火车，我们机关是安排在后面，农工委员会更在后面，所以进入汕头，是最后来的一批。时间已近黄昏。街上关门闭户，冷冷清清。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征兆袭击我们的心头。到达机关后，先到的同志告诉我们，广东反动军队在后面袭击我们，声势很大，我们正在艰苦应战，东江一带也有敌兵控制，情况很严重。我们如果早到两个钟头，还会遇上这里的街道战。原来汕头市面临海边，英、美军舰大批留驻海面，而敌人的几只兵舰，就在它们——英、美军舰后面，借外船掩护，逐步逼近汕头市，并向市区开炮。我军既无军舰，

又少重武器，也不便向外舰开炮。下午三点多钟，敌人用舢舨运送海军陆战队向我们袭击，而且不少敌军已冲上大路。由于我英勇阻击，给予大量杀伤后，残部才狼狈逃窜。当同志们指点停泊海中的军舰，发射的灯光，紧促的军号，隐约中还见到几只比外舰较小的船舰，据说就是国民党军舰。真令我们怒发冲冠义愤填膺。

第二天，远远望去，国民党的军舰已见不到了，但外舰还是停泊在海中。街上店铺已经开门了，行人多起来了，我们指挥部的纠察队经常在街头上巡逻，秩序也恢复了。到农工委员会来联系工作人也络绎不绝。于是开始着手恢复与扩大群众组织，市总工会和农民协会都设立了机关，挂出了牌子，开展工作了。

第二天，跟随农工委员会南下的同志都分了工，我被派作工运科的干事，心里起了极大的反感，还依稀记得中共江西省委刘九峰同志也是被安置一个普通职位，我也替他鸣不平。

在汕头，我多次见到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他现在是兼外交特派员。因汕头有外国领事馆，在这里需要办理外交。他很忙，部队政治工作要搞，宣传工作又要搞，见面时谈不几句话，就忙他的去了。本来我也想对他提出我要转移工作的事，看到他那末忙，也就不好提了。

这时，陆续得到前方军事失利的消息，特别是海口已被封锁，苏联接济的船舰无法进港，局势十分严重。行军以来，伤病兵过多，很少补充，粮食补给已很困难，而敌军又向我们紧逼，乌云密布，气氛又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我们那位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本来是个老革命，又是起义军领导人之一，却沉不住气，整天躺在一间小屋子

里的行军床上，长吁短叹，动不动发脾气骂人。有一次，当地有几个同志要找张主席，正巧遇上我，要我同去找他。当我陪同到了张房前，我先进去，告诉他有人找他，得到的答复是：“叫他们和董秘书（方城）谈。”尽管几位同志再三要求，他仍躺在床上不动，置之不理。我只好带他们去找董秘书。就在这几天里，从没有见他外出，终日垂头丧气，平时的骄傲官长变为被打败的公鸡。由于这样，会里很多人都受到他的感染，斗志变得消沉了。

败走海陆丰

九月二十四日到达汕头整休后，在一个星期日晚上，传来行军号令，匆忙的上道。沿堤走了好一段，折向退了潮的沙滩，经过一段漫长的道路，上了一条大轮船。这时，沙滩上人很多，船只也多，碰到许多熟人，打听不到真实情况，仅知道撤向东江前进。这次是轻装，有的单位不仅不再带马匹，稍为笨重的物资也都丢了。这时人心惶惶，不知前途是凶是吉？好在多是外地人，没有什么负担罢，问题是远来闽粤海滨，语言隔阂，引以为苦。大家都存在着拿起枪杆闹革命的心情。

船行驶了不久，我们就离船步行，方向是朝南走，走在乡间小道。既有机关人员，也有部队，还有不少被打伤了的官兵聚集在队伍中。

走了两天，队伍愈走愈乱，有的插进别的队伍，有的落在后面，有的单位，如财政委员会的机关人员就将携带银币分给每人一些，表面上是说各人带运一些，实际上是作应急变费。农工委委员

会的头头如张国焘、董方城等，早已不见了。情知大事不好，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走走停停，都沿乡间小道，过惠丰长城，也只在城边插过。走过惠丰长城一段路，快近黄昏了，我们正在田间行走，两边远远的都有连续不断的小山头，一个接一个的城堡式的屋场。不料枪声就从两边袭来，子弹从头上嗖嗖飞过，开始还以为是反动民团的袭击，接上枪声很密，知道是遭遇敌人了。队伍霎时大乱，有的丢了担架跑，有的正在丢掉背包。偏偏这时前面有一条小港，我虽是不会泅水，也只好跟着大伙儿下水，幸亏政治部宣传队一位女同志把我拖过了河，总算死里逃生。但枪声未止，大伙儿向前跑，不管有路无路，径往前冲。就在这时，一些军官簇拥着叶挺同志到来，登上一个小山坡，我跑步向前，准备到他身边去，不料后边的反动民团又在城堡内向我们打冷枪，他们向前跑，我追也追不上。沿途只见丢弃的东西，甚至枪枝，狼籍在地上。

时已黄昏，同路的几个人，彼此都不认识，虽然枪声已止，又怕敌追来，尽管十分疲累，仍然继续奔跑，一夜未停。直到天明，才见到几个熟人，其中有市青年部秘书周郁文，总工会干事淦克鹤等。此时此地相见倍觉亲切。就此结伴同行。原来是朝西南方向行进，想到陆海丰去。但听周说，革命委员会已经确定只保留一些军事力量，非军事人员，各自分散。原来在离汕头途中已经作出决定，但农工委员会未曾告诉我们。这样，只有折向东南，寻找海船，去香港转上海，再作计较。由于军事失败，尽管此时已进入东江地段，革命基础虽好，但这几年反动武装力量也颇强大。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还是小心翼翼的探索前进。由于路

不熟，语言隔阂，各地村民有戒心，不理我们，我们也不敢接近他们。一路上，看到一些逃散的人员（其中有江西教育厅长肖炳璋），都是找船出海。大家认为还是分散走好，因此，只好各走各的路。

走呀，走呀，遇上附近村子里的姓黄的华侨，虽然是广东口音，但比较好听。由于他是一个人，我们有五、六人，不怕他，边走边搭话。要求他给我们找船去香港。他说，最近政府严密戒备，一律封锁，我们一去就会被拘捕，只有在偏僻海边，雇小船出海。由于要凑满一船，船也不是经常开航，需要等待。承他的情，邀我们住到他家里，一住四、五天，毫无消息。但他对我们很殷勤，村政权来调查，他都设法为我们应付过去。尽管心里急，也无可奈何。

离开革命队伍

等了五天，姓黄的华侨终于为我们找到了出海去香港的船只。我们一行六人，随他走到海边，只有一只小三桅船停在那里。上船后，船上有不少人，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同志，有浙江的，湖北的，据说找这条船，转弯抹角，花了不少钱和气力。每人船资是五元。等不一会儿，一个小船，却挤了四、五十个逃难的人。接着扬帆远航。

就在这个困难的时间，枪声大作，只见一只帆船向我们冲来，知道遇上海盗，真是祸不单行。枪声是示意我们的船下帆，船上水手乖乖听命。当海盗船靠近时，只见无数彪形大汉，头戴面罩，手持长短枪，当船驶近时，就有海盗跳了上船，接着，把

船用索连住，把一船四、五十个人赶上船头，经过搜身，一个个搜得精光，勒令下舱，海盗船满载而去，而我们则衣物全光。我身上有些钱钞，原拟作应变需要，由于毫无准备，无处可以隐藏，全部搜光。从此，一文莫名，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好不容易到了香港，正要上岸，港边有些好心肠的人说，你们快点跑，今天上午港捕已经抓去了好几船败军。但是我们一身光光的，心想，跑也无处跑，此间人地生疏，抓去也不过是当作散兵游勇关进牢房。

我们六个人，初到香港，大厦林立，人们西装革履，市面热闹异常，连电车也是两层的，港民有点洋气。我们向人打听情况，一问三不知，后来用英文讲，态度却为之一变。得知当晚就有一条太古洋行海轮驶沪。六个人中只有周郁文身上还存了两个金戒指，几元钱，原来他是藏在船蓬夹层，未被搜去，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于是又用英文探问金铺，把金戒指兑换，再到一家食品店里吃了一点广东点心果脯，就走到太古船公司码头售票处。谁知船票很贵（包括饭钞），六个人的船票钱还差一半。还是同行的上海工会谌某（上海人）他有一些经验，建议我们做一做“黄鱼”。开始我们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水手私带“客人”，这客人就叫“黄鱼”。即由谌出面，找到船上的一位宁波水手，讲好条件，付了约莫一半价钱，就让我们以送客人行李为名上船。上船后就躲在船底修理工匠的黑房里。一连几天，就是隐藏在船底生活。吃饭时，去舱面上箩筐里舀饭，晚上就睡在舱板上。只当查票时（本船仅在汕头停泊，只查两次），带我们的水手事先通知我们避开。方法是等客舱查过后，把我们带到统舱（货客混装）躲避，两次都安然无事。听说有几个人不小

心，被美国驻船水兵抓到，吊打了一顿，到汕头赶上岸去了。

在船上，载着不少困难的人，有的也是跟我们一样做黄鱼，由于这样，船泊汕头时，我们就特别小心警惕。好在是外船，中国军队不准随便上去，也就得免于难。

在汕头，见到不少由汕头上船的各省机关和部队的同志，有的远从武汉赶来，不幸未赶上却做了难民。其中三军政治部的李书城就是其中之一。这时，船往北开，天气已入深秋，我衣单鞋破，李君慷慨送给我衣服一套，鞋子一双，银洋两元。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到上海，天刚黎明，船还停在黄埔江中，为避免反动军警盘查，急忙各雇舢舨上岸，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高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倪南山

一、高山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情况

高山地处长江南岸，离旧安徽省会偏东南七十公里，在东至县东部四十公里，与江西边界约六十多公里处。高山本身方圆一百七十余华里（含山脚下周围地区），东连贵池县湖山狮毛岭山脉、西崖、程山寨、连接沙山，和祁门大洪山脉隔川相望。西南与祁门仙女岭、龙头岭、江西的杨关岭至浮梁的茶培山，隔姚黄到金村平川一坂之隔。高山本身是以秋浦的南山尖、贵池的小尖和大龙坑与坞溪坡一千二百米至一千五百米的主峰形成。高山四面山水向内流，到大龙坑、石门口出口，在泉水坑会合，流向东坑，直通坞沙河。高山主要的道路有三条：一条从夏项街至桂桥中间上山，地形险要，悬崖峭壁，鸡棚口自然形成居高临下的关卡；一条从贵池的芦村和井边，经西坑到黄豆岭（老年人传说以前有兄弟二人挑担子，到了岭头，肚子饿了走不动，在岭头上却发现了一粒熟黄豆，兄弟二人分吃了，肚子不饿，精神充沛，把担子挑回了家，从此，人们把岭头称为黄豆岭），岭陡险要，坚守为寨是很好的地形。另一条是从罗家坞经东坑到石门和谢家滩，是一条两边山高、林密、悬崖陡壁，难以行走的险路。除这三条道路之外，还有两条小路：一条从贵池的南山塘经桃岭直至石门，一

一条从杨弯经破山圩到壕猪坑直到石门。其它山头上的羊肠小道，都是红军走出来的。

高山周围(指山脚下)村庄稠密，约有三万多人口。山上，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主要是从江北过来的客姓，约占百分之七十，分居在山上十多条大小坑内。祖居高山历史较久，只有姓洪的和姓谢的两大姓。两户地主，五户富农，雇农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雇农主要利用山水河流，安装水碓几十个作香粉的场房(敬神、迷信用的香)他们长年累月从山上把小杂木砍下，劈碎晒干，夜以继日不停地劳累舂成香粉，运到洪家堰，也有的客商上门廉价收购后转运卖给商人。雇农们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钱养家糊口，生活极为穷苦。高山茶叶很有名，远销江苏的苏州、无锡、上海等地。广大群众种植的茶叶，都系谢、洪两家地主、商人所控制，价钱很低，群众所得寥寥无几。高山资源丰富，还有毛竹、杉树。由于交通不便，运送下山困难，只有靠人力扛到东坑下游才能编成小木排运出，费力大，收益少，多为投机商人所把持。

高山周围和贵池、秋浦、东流等地，都是自然小农经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都为地主、富农所有。自耕农土地也不多。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只有少数土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依靠租种地主或一部分富农的土地，收得的粮食要交百分之四十或六十的地租，还要经受高利贷、卖青苗、买青苗的剥削。一亩地的青苗卖给地主十块钱，收割时不管收多少，全归地主所有。广大贫雇农长年辛勤劳累，做牛当马，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有的卖儿卖女，有的弃乡背井逃奔他乡另谋生路，情景十分悲惨。

以高山为中心地区，阶级关系极为复杂，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散兵游勇，胡作非为，土匪横行霸道。五十年前，有一个出

名的土匪头子朱逢仁——北伐军逃下来的东流人，成群结伙多至三百余人，把高山地区变成匪巢。他们流窜东流全境、秋浦、贵池大部分地区。除绑票（诈钱）之外，还抢劫奸淫妇女，吃喝玩乐，象一群野兽一样蹂躏人民，把美丽富饶的东流和秋浦、贵池一些地区糟蹋得鸡犬不宁。然而，苦难的生活，残酷的压迫与剥削，激起了高山地区人民迫切要求革命、要求解放。这就是我们党在高山地区领导广大劳苦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社会基础。

二、党的秘密活动与组织的建立

早在一九二九年前，党就从大别山派了一些党员到东流地区进行活动。一九三三年初，中共皖、赣边区分局委决定，以高山为中心开展贵、秋、东地区的革命活动，并派黄天贵同志为书记，黄国太为副书记，组成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他们随匡龙海独立师来到高山，主要活动在高山的大垄坑、东坑、火垄坑、茶园、洪家堰，九都塔地区，并以黄炳炎、欧阳斌同志为核心组建了党支部（支部书记黄炳炎同志被敌人杀害）。在北山村也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为马加全。之后，又逐步发展到店隆保、道士楼、桂桥许村、铁佛祠。一九三四年初，更发展到烈山、莘田、东庄、永济亭、三公庙、排棚、梅树下、老三陈和东流的青风岭附近、二甲里、八甲里、赉田汪、麻坞石、源坑方家一带。

一九三三年底，黄天贵、黄国太同志在沙山与江边特委的中共中心县委书记余文先取得联系，共同发动了以贵池、虎山徐家为中心的农民大暴动。失败以后，余文先同志转到同黄天贵等同

志一起，于一九三四年底，又与江西浮梁县小源地区中共皖赣边区中心县委周成龙、王丰庆同志取得联系，为一九三五年在高山地区组成中共江南特委打下了工作基础。由于广大劳苦群众迫切要求解放和得到土地，在党的领导下，有些农民对地主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加上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农会干部已经暴露，引起了阶级敌人的严重不安，安徽省保安旅楚团又从高坦地区分别进驻丁香树、洋湖坡、九都岭、夏项街、莘田坂等地设防，向革命群众发动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一九三四年五月，从姚黄开始，迅速波及到整个贵、秋、东地区，再一次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在情况突然变化，形势严重的日子 里，有些投机分子出卖革命，叛徒何甘杰向敌人告密，出卖了黄炳炎同志。黄炳炎同志被逮捕后，敌人对他用尽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严刑拷打、诱骗、没有使他屈服，最后被敌人杀害。同遭杀害的还有王三娘、刘长发、甚至被敌人砍下头颅，挖心示众。敌人还利用乡、保、甲长、特务，进行恐怖、欺骗宣传：

“凡通匪者不报、不交出同伙者，一律格杀勿论”，“凡自首者，交两块洋钱（硬币），并交出未办自首的人一律无罪”。有些农民被敌人的欺骗宣传吓倒了，纷纷向敌人自首，交两块钱的手续费，领回“自首证件”。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秋浦、东流地区乌云笼罩，到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卖儿卖女的悲惨情景。

虽然敌人把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又一次暂时的镇压下去了，但经过几次革命风暴锻炼的贵、秋、东地区的党组织以及中心县委的余文先、黄天贵、黄国太等大部分党的骨干力量仍保留下来了。如欧阳斌、江丛兴、黄炳炎、黄时贵、黄老四、何希吾、朱旺林、江小妹等，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仍然坚持为革命不

断活动。为贵、秋、东地区在政治、思想、组织上，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三、中共江南特委在高山诞生，革命斗争形势大发展

贵、秋、东地区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广大劳苦人民心向党，敢于向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农历）三十晚上，就曾经准备大暴动，夺取秋浦城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进行革命斗争。但由于叛徒告密，在暴动的前一天，就遭到敌人镇压，许多农民领袖惨遭杀害，使暴动未能实现。后来，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率领红军进攻九江，转战秋浦，出击东流，并在秋浦的石门街建立了革命临时政权。他们在回师闽、浙、赣苏区时，又组建了中共皖、赣边分局委和红军独立师，匡龙海同志为师长，柳真吾同志任分局书记并兼任政委，王庆丰为政治部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党的武装力量在皖、赣边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推动了贵、秋、东地区党的工作开展。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又组织起以贵池虎山徐家为中心的农民大暴动。几次农民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运动的猛烈的冲击，使农村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教育和锻炼了农民要革命、要解放的坚强信念。又由于我们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坚苦奋斗乃至英勇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精神，以及红军秋毫无犯的模范纪律，深受江南广大人民的敬佩。尽管敌人拼命地加强他们反动的乡、保、甲组织，派遣大批特务、情报人员对农民进行控制，但是只要看到红军和我们党的工作人员，革命

群众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帮助和掩护。余文先、黄天贵、黄国太、欧阳斌等同志在九都被暴露，不能工作，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出没无常，时而出现在莲花山，时而出现在高山大垄坑、小垄坑、青风岭、源坑一带活动，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为他们保守秘密，运送粮食，探听敌人情报。帮助他们四处联络那些在白色恐怖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和农会干部，使破坏了的党组织、农会组织很快就恢复、重建起来，高山地区又开始出现了大好形势。

一九三五年春，在敌人锋芒暂时减退的情况下，中共浮梁小源地区中心县委，已转移到秋浦马坑，贵、秋、东中心县委黄天贵等同志同周成龙、王丰庆同志取得联系，相互交换敌情和农民运动的情况，研究了在新的形势下，主要的斗争方法和策略，以及今后的任务、方针和政策等问题，积极地在贵、秋、东地区对农村反动地主阶级、敌特、自首变节、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镇压。比如对四房村恶霸地主周保东、九都塔的叛徒何甘杰，道士楼敌特分子王小乐的儿子，地主商人谢观富等坏分子的镇压，对乡、保长等反动分子的镇压，给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及其反动的乡、保长制度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激发了广大劳苦大众的革命情绪，基层农会干部、党员革命斗争的情绪更为激奋，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宣传什么共产党被消灭了，红军被消灭了，都是欺骗我们的反动宣传。由于斗争的初步胜利戳穿了敌人反动宣传的阴谋，人民群众过去对敌人的害怕心理，迅速地转到对敌人、地主剥削阶级的仇和恨，敢于同地主剥削阶级和反动的伪政权乡、保、甲长进行斗争，积极地配合红军打土豪，没收敌伪财产的斗争。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有些动

摇分子又开始转向革命，要求接收他们参加农民协会和贫农团。

中心县委余文先、黄天贵、黄国太等同志也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并广泛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为了唤起劳苦大众起来斗争，推翻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反动制度，县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同贫苦农民交知心朋友，不知疲倦地进行革命宣传，讲革命道理，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响亮地提出了：反对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劳苦大众。在工作方法上采取点和面相结合，波浪式推进的办法，积极发动贫雇农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贫农团。到一九三五年春，秋浦的高山大垄坑、小垄坑、东坑、石门、谢家滩、鸡棚口、茶园、洪家堰、九都塔，东流的烈山、源坑方家、赖田、青风岭、东压等地的农村，根据不同的斗争条件，有的建立了秘密的农会，有的公开或半公开成立了农民协会，拥有两万多农会会员。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周成龙、王丰庆、欧阳斌、江丛兴等三十多人，从马坑来到高山，中旬在高山石门洪家召开了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人欧阳斌、江丛兴、倪南山、江天辉、曹德皇，陈××（老山陈区委书记），红军团长杨××、杨春标、长江游击大队陈大队长、皖赣边游击大队毕大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议程是：分析当前敌情，大家认为安徽保安旅楚团已全部集中到了丁香树，回芜湖调防，中途陈营长打死楚团长，实行兵变未成。他们勾心斗角，矛盾突出，困难重重，一时难以回来，这个旅另外两个团现在大别山区东部，对付那里的红军，一时难以抽回。蒋介石在江西反动军主力，尾追我两大红军主力，还要集中相当多的军队，对我苏区进行“清剿”。这

样，江南仍然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地，空隙很大，有利于我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还分析了贵、秋、东地区前几次农民暴动或准备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人保存下来了。大家认为这就是我们党和红军坚持贵、秋、东地区革命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形势。根据当前形势，我们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1、建立以高山为中心的“永久”根据地，东北向祁门、石台，西南向江西浮梁、波阳、都昌、彭泽（指武山地区），北向长江沿岸广大地区发展。要广泛地发动农民，向农村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

2、为了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决定在短期内组成中共江南特委，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委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在高山组成。特委书记周成龙，副书记余文先，委员：王丰庆、欧阳斌、江丛兴、倪南山、黄天贵。在特委统一领导下，组成三个中心县委：贵（池）、秋（浦）中心县委，书记余文先兼任，以高山并向四面发展为活动地区；秋（浦）、东（流）中心县委，书记黄天贵，以青风岭、赛田、源坑方家为活动地区；祁（门）、贵（池）、秋（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国太，以贵池的莲花山、横店、祁门县上下叉坑等地为活动地区。当时，在三个中心县委领导下，各有三个区委，以后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区委。

3、决定把活动在皖、赣边区的三支红军部队，即：长江游击队，皖赣边游击队，侦察连（内有江边特委红军游击队）和匡龙海独立师失散的部队（收拢来的），共计五百七十余人，整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又叫特区独立团。这一决定统一了红军

的指挥和作战行动，形成了坚持江南斗争的拳头，有力地推动了江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为了发展地方武装，有利于及时对地主阶级的乡、保反动政权及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推动地方工作大发展，从红军独立团抽调了五十多余人，组成三个游击大队，归各中心县委领导，统称为江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游击大队。这样，三个中心县委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既有利于推动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又能使红军独立团负起机动作战任务。这三个游击大队发展很快，到一九三五年年底，第一、第二大队各发展到九十余人，第三大队五十多余人。这些游击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后，推动和配合进行土地分配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4、特委决定以中共高山区委为主，让高山的土地分配先走一步。首先召开了动员大会，江天辉区委书记作了动员，他号召高山贫雇农迅速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乡、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消灭白匪军，没收地主和一切反动派的财产，把土地分给贫农、雇农、中农。并积极收缴了反动派的一切武装，烧毁了田契、借据、平分了地主的粮食和一切剥削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金、银、财宝。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动农民起来推翻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对整个贵、秋、东地区震动很大，并迅速传播四面八方，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并为全面进行土地分配摸索了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土地分配中，所有土地都要拿出来统一分配，中农自耕地多一点，可以不动；土地必须按人口平均分配（除留红军田外），地主、富农和中农一样分给土地；土地分配原则，应该以自然村为分配单位；

乡与乡之间的划分，应按照各乡分，原来耕种土地，归各乡分配；对有些自然村地少人多或人少地多，要按照各人耕种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山林应该归各乡、各村公有。这些规定是经过贫雇农会议反复讨论，一致同意而决定的。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深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高山广大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和土地，是一次英勇的革命斗争行动，是贵、秋、东土地革命的先声，也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农民大暴动组成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声春雷。一九三五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在四房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一百八十余人。会上决定，成立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推选欧阳斌同志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在四房村祠堂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庆祝苏维埃政府胜利成立的大会。欧阳斌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把各级苏维埃政府迅速建立起来，领导广大农民向农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打倒一切反动势力，迅速掀起分田分地运动。大会后，各县及、乡、村苏维埃政府迅速成立了。掀起了势如破竹的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的斗争。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扩展到南边的姚黄、麻石岗、白水张，东边的贵池原头李家，过田王、占波、大堰、栗阳街、沙山、波里、万亩坂、东岗、洪水田，西边的高、低岭脚、马田、张溪镇、八都、青风岭、赉田一带，北边的湖田铺、殷家汇。各地农民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响彻云霄。在革命风暴面前，地主只好把田契、借据，双手捧送到农民协会和土地分配委员会。但也有少数地主借口说：田契和借据被某人带走了，要等他们去取回来，

拖延不交，妄图等待国民党反动军队为他们解围。这些等待变天的地主、恶霸分子，在农会严肃催逼下，不得不俯首听命，低头认罪，保证今后一定要遵守苏维埃政府法规办事等等。此时的地主劣绅威风扫地，见到农会的人点头哈腰，有些做过坏事的人，干过乡、保、甲长的坏分子，再也不敢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了。打倒了地主、劣绅和伪政权，并分得土地后的广大贫雇农民兴高彩烈，开始作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在广大贫雇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的基础上，迅速地组织了区、乡人民自己的武装——赤卫大队、赤卫中队，在党的领导下，向盘据在苏区周围的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农民协会还规定：不许任何人向敌人据点出卖菜、柴、米和其他必需品。敌人一出来，赤卫队就用土枪、土炮等武器进行袭击和骚扰，使敌人寸步难行。驻莘田坂的敌人，吓得跑到丁香树去了。广大赤卫队，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苏维埃政权，阻挡敌人对高山周围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同志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四房村的徐财生、汪三元烈士的母亲储小娘等同志，就是执行曹德皇区委书记的指示，到敌人据点丁香树去侦察敌情而被逮捕，活埋在河波沙滩上的。他（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保守了党和红军的机密，他们的高尚品德使我终身难忘。

四、为保卫高山革命根据地而英勇斗争

红军独立团的前身——游击大队，在皖、赣边地区，尤其在贵、秋、东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冬，匡龙海同志率领红军，连续打下了姚黄，源头李家、金村，全部消灭了地主武装五十余人（打死、打伤二十多人，俘获三十余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红军长江游击队一百三十余人，奇袭东流县保安大队驻洋湖坡的一个中队六十余人。这次行动，红军乔装敌保安旅部队，从永济亭出发到达洋湖坡，敌人正在吃早饭，敌哨兵喊出粗鲁的口令：“你是那一部分，干什么？”红军响亮地回答：“我们是夏项街来的，陈营长（敌人营长姓陈）命令我们来接防的！”接着又问：“你们中队部住在哪里？我们要见你们中队长！”吃饭的敌士兵说：“我们都住在戏楼上，中队长吃饭去了，马上就回来，请稍等一下。”正在说话时，敌人中队长从他老婆那里吃饭回来了。敌人士兵手指着说：“那就是我们中队长”。红军侦察员机警地走过去，不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即把他打死，同时，红军迅速向住在戏楼上的敌军发起攻击，打死打伤戏楼上和广场里的敌军二十余人，俘虏三十余人，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子弹两千多发，还有许多手榴弹和其它军用物资。躲起来漏网的不到十人。在红军突然打击下，敌人来不及抵抗，就全部被消灭，仅用了五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同年四至七月，在九都塔及其附近，伏击敌保安旅阵营（敌人营长命名），三战三捷，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人，俘虏十多人，缴获长短武器三十多支，花筒式冲锋枪四挺，子弹一千多发。在这前后，红军独立团在王丰庆同志亲自指挥下，以远距离奔袭安（庆）、屯（溪）公路的重镇殷家汇，全部消灭地主民团三十余人，并活捉敌团长，缴获各种枪支二十余支，弹药数百发。

英勇善战的红军独立团，在贵、秋及其他地方，也打了不少

胜仗，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农村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民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打击，使广大群众受到鼓舞。但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二甲里至赉田之间的伏击战，由于红军指挥员的过错，造成战斗失利，迫使江南特委从麻坞石迅速转回高山，影响了贵、秋、东地区斗争的全局。

赉田伏击战是特委周成龙、王丰庆亲自布置，代团长杨春标亲自指挥的。决定这次伏击战，是根据离麻坞石中共江南特委驻地比较近的侯家店、洋湖坡两个敌人的重要据点，各驻有安徽省保安旅一个营，敌人准备对麻坞石采取分进合击、包围特委，妄图把特委和苏维埃特区政府一网打尽。根据敌人这个部署，特委决定集中红军独立团主力，在赉田至二甲里之间、源坑以南，歼灭由侯家店来犯之敌的一个营或者大部，对洋湖坡来犯之敌，主要由江南红军第一游击大队和赤卫队负责坚决堵击，以策应独立团对来自侯家店的敌人进行歼灭战。这个目的达到之后，再找机会消灭洋湖坡之敌，达到消灭两个营或者大部分的目的。这样，特委就可能对整个东流区的革命斗争坚持比较长时期的领导。按当时主、客观的情况看，歼灭这两股敌人，是有把握的，但由于代理团长杨春标的过错，贻误战机，不仅失去歼敌机会，反而使独立团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江南特委和机关在敌人直接威胁下，不得不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撤离麻坞石，绕道郑家村回到高山。各地游击队和在高山周围地区的赤卫队，也只好陆续撤到高山脚下。这样安徽省保安旅三个团和贵池、秋浦、东流以及附近县的保安团（大队），都先后窜进了以高山为中心的附近地区，最后还进逼到高山外围。

从一九三六年元月中旬开始，主要的战斗，就在高山外围进行。当面的敌人仍然是安徽省保安旅和各县保安大队（团）以及新组织起来的地主还乡的民团。敌人兵力部署是：保安旅旅部带一个团驻贵池的高坦、栗阳街、洪水团一线；一个团团部带一个营驻葛公镇、姚黄、三分店、排棚一线；一个营驻夏项街、九都塔（新屋查一个排）、四房村一个连。安徽伪独立营从石岭查、虎山一线移到横船渡、桐子岭待命。由于敌人吃过红军不少的苦头，这次采取了分进合击战术，每前进五里至十里就修建碉堡，留下少数兵力，继续逼进，采取步步为营战术，来对付红军和赤卫队。同时，敌军每到一处，采取移民并村的法子，强迫群众拆民房修土围子，把群众关在里面，不让外出，使群众与红军的联系隔绝开来，使红军的行动和党的工作增加种种困难。红军虽然在东流、秋浦、贵池和远距离高山的外围不断地活动，钳制敌人的进攻。但敌人以高山为目标的进攻和“扫荡”、“围剿”，妄图把红军和党的组织赶出高山，最后一网打尽的反革命阴谋计划，并没有任何改变。为了保卫以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摆在我们党和红军面前的任务，就是进行一次生死存亡、艰难困苦的斗争。下面我重点说说保卫高山的战斗：

一九三六年元月下旬，姚黄一带地主民团进驻在源头李家（鸡头岭山脚东边）；葛公镇一带地主民团也进驻三公庙、排棚（鸡头岭山脚下西边）梅树下；洋湖坡、永济亭一带地主民团也占领了店龙保、洪家堰一线。夏项街、许村等地民团计三百余人，开始了向高山鸡栅口第一次的进攻，遭到我第一游击大队和特区保卫队及当地赤卫队一百八十余人的坚决抵抗。由于我红军坚守工事，又有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敌人发起几次冲击和疯狂反扑，

均被我红军打退，从上午九时打到下午三时，敌人的进攻都未得逞，最后抬着二十多具伤兵撤回原地。

二月中旬，敌人从东西两面联合向我高山进攻。东路敌人仍然从芦村、井边两路合击黄豆岭，我第二游击大队和赤卫队，仍然坚守黄豆岭工事，进行了坚决抵抗，凭借工事先用手榴弹打，后用准备好的石炮打，黄豆岭居高临下，炸药炸开了石头，石头飞滚，打得敌人喊爹叫娘，到处乱窜，敌无可奈何，不得不狼狈逃回原地。西路敌人向鸡棚口进攻，遭受到我第一游击大队和赤卫队的坚决抵抗，但由于手榴弹、子弹基本上打光，土枪威力不大，又无粮食，在敌人连续不断的进攻下，我军被迫转移到石门口一带继续抵抗敌人。这路敌人突破我防线后，冲进鸡棚口附近村庄，把群众所有能用的衣服、用具全部抢走，剩下的用具和房屋放火烧光，群众也被带走。鸡棚口党支部书记蔡家银及其父亲，被敌人搜出逮捕，带到许村被杀害。

紧接着第五天，敌人仍然分东西两路继续进攻高山，东路有安庆的伪独立营配合，仍从芦村、井边会合西坑，向黄豆岭第二游击大队赤卫队进攻。从上午九时打起，三次被我守军打退。下午一时左右，敌人独立营一个连，从芦村东侧爬上大山岗，顺着大岗向东迂回到我守黄豆岭部队侧后，在敌人侧击下，我第二游击大队和一部分赤卫队，被迫撤到小垄坑山岗。在撤退中，第二大队周副队长中弹，英勇牺牲。敌人攻占谢家滩村，也洗劫一空，所有房屋全被烧光，并带走数十名群众，仍退回原处。谢家滩村化为灰尘，躲在山上的群众看到自己的房屋火光冲天，号啕大哭，凄惨的情景使红军指战员流下了热泪，发誓要消灭这帮穷凶恶极的敌人，为人民报仇。西路的敌人，向我坚守在石门口、

大窑坑的第一游击大队和赤卫队进攻，由于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易守难攻，敌人一直打到下午四点钟，不得不退回原处。

形势越来越严重，坚持高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困难。有一部分群众被敌人赶下了山，有的躲在树林里不敢出来，有的到外地暂时避难。红军指战员情绪低落。更严重的是坚守高山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在这样严重的关头，特委召开了县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人企图把我们党和红军围困在高山，采取经济、物资封锁，从政治上进行劝降，要群众下山，要本地战士放下武器保全生命用种种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分化瓦解我军，最后，达到消灭我高山革命根据地的目的。面对敌人对我进行经济、生活物资封锁，造成难以克服的严重形势，特委作出如下的决定：

1、对特委和各级政权机关实行精简，留下少数人主持日常工作。特委将精简出来的五十多人，分成三个组：一组十三人，由财政部长江丛兴、共青团书记何少义带领，到石台兰田、杨家墩、柯村一带，一面进行秘密工作，一面寻找那里的党组织，恢复当地工作（不久被敌人发现，遭到破坏，江丛兴同志不幸牺牲）。另一组七人，由操则成（特区政府秘书长）带领，到石台横般渡、桐子岭、沙山一带进行秘密工作（不久也被敌人破坏，操被捕后叛变在安庆敌人特务机关工作）。再一组由王玉堂（特区军事部秘书长）带领到红军独立团，充实和加强连队政治、文化工作。

2、决定组织高山秘密的区委，区委书记宋金山（江西贵溪人），其任务是坚持高山长期革命斗争，收集失散的红军和工作人员，负责对红军、特委联络站的工作。

3、决定红军独立团，组织一支先遣队——挺进纵队到江西浮梁、婺源找中共皖、浙、赣省委，汇报工作情况，建立联系，并请示省委对当前斗争、工作的指示，返回高山向特委汇报（但挺进纵队一出未回）。独立团还有二百八十余人，组成挺进大队，继续向贵、秋、东（原来苏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战机打击敌人，钳制敌人向高山进攻，相应恢复那里的工作。挺进大队向秋浦高岭、倪家河、转移到青风岭、源坑一带活动半个月左右，又从殷家汇、横般渡秘密回到高山东北山坑的新岭脚，准备整休三天。王丰庆同志赶到坞溪坡（大奎坑山背最高一个地方）向特委汇报，说回到贵、秋、东原来地区，找不到群众。认为群众被地主民团镇压下去了，恢复工作困难极大。在回顾和汇报红军本身工作后，他说独立团在原来五百多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本地人多，在这次行动中开小差的就有三十多人。同时弹药不多，粮食很难搞到，红军生活极为艰苦。王丰庆的意见，要向江西浮梁活动，一面寻找匡龙海师长，并恢复浮梁工作。正在汇报时，安庆的独立营打来了，火力极为猛烈，红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边打边退，王丰庆同志跟挺进大队走了。后来他们转到婺源障公山找到省委，就没有回高山了。

4、决定将江南红军第一、二、三三个游击大队，由特委直接指挥，坚持在贵池的山坑、西山棚、新岭脚、坞溪坡，秋浦的大奎坑、小奎坑、东坑、泉水坑、火奎坑、菜园、老山陈一带进行斗争。

红军独立团全部撤离了高山，只留下三个游击大队剩下的一百三十余人，以及少数赤卫队，坚持艰苦的斗争。

二月底，敌人又发起对高山大规模的“清剿”。由黄豆岭进

入谢家滩的敌人，在敌伪独立营支持下，地主民团向大垄坑口进攻，在我第一、二游击大队、政治保卫队、少数赤卫队的坚持阻击下，未能进攻大垄坑。但小垄坑被地主民团攻占了，群众秘密棚里保留的一点粮食和洗换衣服全部被抢走，五十多名群众也被带走，最后，敌人把所有草棚全部烧得精光，退了回去。从鸡棚口来的敌人，搜查了嚎猪坑附近一些小坑。把特委埋藏的二十多担食盐挖走，群众的东西也被抢光，还把所有的房子和草棚烧光，把全部群众带走了。

三月上旬，敌人分数路向高山进行“围困”、“清剿”。东路的敌人由黄豆岭直插小垄坑，占领大垄坑背后主峰，策应大垄坑口的敌人，向大垄坑里面进攻。敌人进到大垄坑，把八十多名群众全部带走，能带走的衣物全被抢走，坑里的二十多幢房子也被烧毁。大垄坑的党支部书记被敌逮捕，他被抓时，同两个敌人搏斗，一个被他推到岭下摔死，又遭到十多个敌人的围攻，终于不幸被抓枪决，当他牺牲时，挺胸抬头，高喊“打倒国民党，打倒白匪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他那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人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英雄印象。从鸡棚口进攻的敌人，配合从洪家堰上来的地主民团一部，进攻东坑，把东坑所有群众、制香粉的工人全部抓走，施行了三光政策，房屋、草棚和群众所有财物烧得一干二净，退回原地。洪家堰另一部分地主民团，向茶园、火垄坑进攻，同样把群众抓走，烧光、抢光。这时的高山，暗无天日，乌云笼罩，幸存下来的群众，见到红军满腔悲痛，无比凄惨，美丽、富饶的高山，在敌人的铁蹄下被践踏得遍体鳞伤。

三月中旬，祁、贵、秋中心县委黄国太同志，带领第三游击

大队，来到坞溪坡，周成龙、欧阳斌、倪南山、江天辉、黄国太等人，开了一个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解决了三个问题：

1、将第一、二、三三个游击大队整编为江南红军独山营，营长黄国太，政委江天辉、特派员倪南山。

独立营的任务是：坚持在山坑、西山棚、坞溪坡、老山陈和莲花山、横店开展游击战争。

2、将在麻石岗第三次战斗中负伤的皖赣边游击大队毕大队长委托给种玉米的三个群众护理，治疗，并留下些钱和药品。毕大队长因受伤过重，据说不久光荣牺牲了。

3、周成龙、欧阳斌同志带十多人（主要是短枪队），仍然坚持坞溪坡、老山陈一带活动。并规定少则八天，多则半个月在大垄坑主峰联系一次，并规定联络信号如白天鸣枪三发，晚上三堆火为信号。

我们独立营开到贵池、祁门交界的大洪山脉、牯牛岗、莲花山。横店一带活动了八天，于三月二十八日晚，秘密回到西山棚，派出一个班由排长刘长久带到大垄坑主峰与周、欧带的短枪队联系，等了一天一夜，按照规定信号都没有联系上。这个班在回到西山棚路口，走到新岭脚时，副班长彭五四带半个班（五人）去丁香树投敌，刘排长和班长杨江连只带半个班回到西山棚。

营部三个领导人，分析了没有联系到周、欧二人原因，并为下次的联系焦急，联系不上怎么办？这时我们的情绪都很低沉。回顾我们党和英勇的红军在贵、秋、东这块地区坚持了几年浴血奋战的游击战争，红军指战员和党员，以及革命群众的鲜血洒满了贵、秋、东的大地，难道贵、秋、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就此

结束了吗？我们的心里都十分难过，不少的干部、战士都流下了热泪。

离开了党的领导怎么办？独立营的战士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害怕离开家乡，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这时的独立营只剩下八十余人，怎么巩固部队？已成为我们工作上和精神上极大的负担。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只有暂时离开高山，到江西的浮梁找分局委匡龙海同志，找不到分局委的同志，我们就转向障公山找省委，再回高山。我们独立营，就这样离开了永远怀念的高山和自己的故乡——贵、秋、东革命根据地的人民。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wODQzNT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084357.zip",  
  "filesize": 7406965,  
  "md5": "3bd3dc3997202918f9e07e60e29b8a2d",  
  "header_md5": "cde1e53af92ec1fb89b94517023d5120",  
  "sha1": "597262d15a99fb556c5997b52ebaed6a080c4f97",  
  "sha256": "bcd0c47e5b8ea8135a6348730db60c875550f19723d1441e925108329afc5692",  
  "crc32": 211827161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7522676,  
  "pdg_dir_name": "10084357_\u6c5f\u897f\u6587\u53f2\u8d44\u6599\u9009\u8f91\u7b2c3\u8f91",  
  "pdg_main_pages_found": 100,  
  "pdg_main_pages_max": 100,  
  "total_pages": 106,  
  "total_pixels": 3509003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